

中国近代史丛书

辛亥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字数 60,000

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001—800,000

书号: 11·1·212 定价: 0.17元

毛主席语录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一、革命前的中国社会·····	1
二、孙中山与兴中会·····	6
三、继起的革命团体·····	12
四、同盟会的成立·····	19
五、和改良派作斗争·····	27
六、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34
七、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41
八、清朝政府的假立宪·····	47
九、铁路风潮·····	54
十、武昌起义·····	61
十一、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崛起·····	69
十二、各地反动势力的篡权活动·····	75
十三、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	82
十四、辛亥革命的失败·····	90

一、革命前的中国社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抢夺殖民地，发动了一连串侵略战争，它们之间也不断发生狗咬狗的战争。

遭受侵略和压迫的人民无法生活，纷纷起来反抗，革命的烽火遍布五洲四海。在这风云激荡的世界潮流中，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也进入了急剧动荡的时期，短短十几年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以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所有这些，反映了一个事实：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激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敲骨吸髓，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在这场生死大搏斗中，反动的清朝政府日益暴露出它甘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后，以西太后为头子的清朝卖国集团曾经公开声明，他们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是说，为了讨好帝国主义，他们愿意彻底

出卖祖国, 出卖人民。在清朝政府的大拍卖下, 辛亥革命前, 沙俄帝国主义早已侵占了比三个法国面积还要大的中国领土, 其它帝国主义继续霸占着中国的香港、台湾、澎湖列岛等地, 并且强行租借了中国的澳门、九龙、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 使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它们还从中国沿海到内地, 开辟了八十二个商埠, 在十六个城市设立了“租界”, 和各地的地主、买办、商业高利贷资本相结合, 在中国大地上密布层层罗网, 搜括中国人民。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已达二十多亿银元, 相当于民族资本的十几倍, 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品市场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以上, 又通过不平等条约、贷款、赔款, 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内地税收, 在财政经济上扼住中国的咽喉。它们的炮舰可以在中国的领海以及内河、湖泊到处乱闯, 它们的侵略军队可以驻扎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军事要地, 甚至当时的首都北京, 使中国的独立徒具形式。它们设立在北京的“使馆区”, 也俨然成了一个太上政府, 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却甘心充当“儿皇帝”。所以,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清朝政府叫做“洋人的朝廷”, 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工具。

清朝政府对外加紧卖国, 对内加紧搜括人民。一九〇一年他们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后, 对人民的搜括更加残酷。清朝政府本来每年的收入是纹银八千万两, 一九〇三年增加到一亿两, 一九〇八年又增加到两亿三千万两, 一九一〇年再增加到三亿两, 十年之间, 使人民的负担增加了三、四倍。为了搜括更多的钱财, 他们挖空心思, 巧立

名目，增加许多新的捐税，也给各级地方官吏造成许多贪污中饱的机会。贪官污吏层层加码，有的地方甚至使征收数额高出清朝政府规定数字的十多倍。这些苛捐杂税不仅逼得广大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也侵害了一部分中小地主的利益，使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它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很快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清朝政府不断出卖国家主权，又把搜括来的钱财，大部分用赔款和偿还外债本息的形式缴给帝国主义侵略者，所以人民群众和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成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焦点。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

在清朝政府严酷的压榨下，受苦最深的是劳动人民，因而首先起来反抗的也是他们。一九〇一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战争硝烟未散，很多地方的人民又拿起武器投入反抗清朝政府的战斗。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间，自发的反清人民斗争发生了近千次，遍及全国各地，直接卷入战斗的群众不下数千万人。随着清朝政府对于人民群众压迫的加深，斗争的次数和规模也逐年扩大。据统计：一九〇五年的群众斗争有八十多次，一九〇九年便达到一百三十多次，一九一〇年陡增到二百八十多次。从这里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政府倒行逆施，早已挖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把它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大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二页。

厦，不论什么人想来支撑，也是支撑不了的。

人民群众的斗争，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它不愿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①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就是它的动摇妥协性，是从它娘肚子里带来的，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辛亥革命前，民族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力量也很薄弱。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前四十年中，民族资本先后开办的近代工厂只有五百家左右，投资约一亿四、五千万银元。这样微弱的资本，不但远远敌不过帝国主义在华的投资，甚至与当时带有封建性的典当、钱庄资本相比较，也不到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无力抵制外国资本，而且相反，他们所需的机械设备、技术资料等，都必须仰赖于帝国主义国家，不少民族企业，甚至不惜招引一部分外资，用“中外合办”的招牌，求得庇护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民族资本家本来就出身于地主、官僚，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土地，继续保持封建地租剥削；有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

的人则以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从清朝政府获得一部分专利权，因而很快爬上大资产阶级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难分难解的关系。

当然，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民族资产阶级要发财，要发展，首先碰到的就是外国商品的竞争和外国资本的打击。卖国的清朝政府，对于外国商品在国内各地泛滥提供种种方便，而对于民族工业的产品则征收重税，对于民族工业本身又加以种种束缚和限制，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要想发展，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而卖国的清朝政府，又必然成为它首先攻击的目标。民族资产阶级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由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妥协性的一面，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就有联合工农反对敌人的一面，也有联合敌人反对工农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反映得相当明显。他们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最后又终究不免于失败，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一个关键。

二、孙中山与兴中会

毛主席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孙中山开始革命，又以其创设革命团体兴中会为标志。

孙中山原来的名字叫孙文，字逸仙，一八六六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的翠亨村。后来他从事革命活动，化名中山樵，所以人们都叫他孙中山。

孙中山有个哥哥名叫孙眉，是檀香山（在北太平洋的中心、夏威夷群岛的中部）的华侨资本家。孙中山在十三岁时到檀香山，随他哥哥生活，先后进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一八八三年回到国内，在广州和香港两处地方上学，一八九二年毕业于香港的西医书院。

从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九二年，孙中山所受教育，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又是在教会学校渡过的。这十四年中，他学到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对于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七页。

早在檀香山读书期间，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曾经大大地鼓舞了孙中山。一八八四年他再次去檀香山，美国正在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吞并夏威夷群岛。夏威夷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再次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不久，他回到祖国，正好碰上卖国贼李鸿章和法国侵略者签订卖国和约，受到很深的刺激。中法战争，是中、越两国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侵略越南和中国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中，各地人民主动参加战斗，使法国侵略者处处受到打击。在这民族意识新高涨、抗法战争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取得丧权辱国的结果呢？经过分析，他认为完全是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它媚外卖国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对清朝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

一八九二年孙中山由西医学院毕业后，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行医，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在行医中酝酿反清政治活动。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回到翠亨村家中，给当时在清朝政府里当权的大官僚李鸿章，写了一封表达政见的信——《上李鸿章书》。

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概括为四句话，叫做“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就是要清朝政府仿行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开办学校，培养人材；设立农官，管理农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筑铁路、设工厂，采用近代机器生产；实行保护商业的政策，使商人有利可图，努力经营。很明显，他是站在资产阶级

的立场上，希望通过李鸿章这样一类封建大官僚，进行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

《上李鸿章书》写好后，孙中山又风尘仆仆地跑到上海和天津，寻找门路，求见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个买办化的封建大官僚，曾用高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机器，开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他的目的，在于保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拒绝接见他。孙中山碰了个大钉子，那份《上李鸿章书》也就石沉大海。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又跑到北京去探听清朝政府的虚实。那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在牙山战役中遭到惨败，举国震动。清朝统治者竟然还在歌舞升平，大修颐和园，准备庆祝西太后六十“寿辰”。吃一堑（音欠 qiàn）长一智，孙中山经过这番阅历，认识到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是办不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只能用暴力推翻清朝的统治。至此，他的革命要求大大增长了。他随着南下武汉，观察长江流域的形势，再经过上海去檀香山，筹划经费，集结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孙中山到檀香山后，积极向华侨宣传反清革命的主张，得到一部分进步华侨的赞助。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华侨中成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最初参加的只有二十多人，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卖国贼李鸿章又代表清朝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割地的《马关条约》，国内人心

激愤。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从檀香山回到香港，组成香港兴中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香港兴中会和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的宗旨大致相同，即所谓振兴中华，挽救危局，斗争目标不明确。但香港兴中会的会员入会誓词中，已经标出：“驱除鞑虏（指清朝皇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代表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纲领，也是他民族、民权思想的初步表现。

香港兴中会的公开机构叫做“乾亨行”，表面上做买卖，实际上是领导广州起义的总机关。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孙中山又设“农学会”于广州，借行医和提倡农业的名义，在政、学各界以及清军、绿林、会党中活动。半年以后，他们能够调动的人员，已经数以万计了。为了掩盖清朝官吏的耳目，孙中山利用广州人民重阳（旧历九月九日）扫墓的风俗，通令各路起义人员，一律装扮成扫墓人，于重阳前一天到达指定地点集中。香港方面运送的枪械、弹药，以及三千多起义人员，也乘前一天夜船于重阳清晨登岸，会齐各路大军，向省城广州进攻。但一切就绪之后，却不见香港来人的影子。等到八点多钟，才收到负责香港方面工作的杨衢（音渠 qú）云的电报，说香港方面的起义人员需推迟两天才能到达。原来杨衢云为了与孙中山争领导权，擅自改动战斗部署，起义计划全被打乱。这样，孙中山只好命令已经集中的人员马上解散，并发电制止香港队伍前来广州。第二天，两广总督得到兴中会的叛徒告密，派兵捕去陆皓东等人。杨衢云接到电报时，派来广州的二百人已经下船，船一靠岸就被捕去四十多人。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

没有正式爆发就被镇压了，但它作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还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悬赏缉拿革命党人。领导起义的孙中山、陈少白等，被迫逃亡日本，设兴中会分会于日本横滨。后来陈少白继续留居日本，孙中山转赴檀香山、美国、英国等地，向华侨宣传革命。一八九六年十月，孙中山到了英国，第二年七月又转回日本，就近策划中国的革命。

孙中山这次在欧洲逗留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对他思想的影响却是很大。他在这期间，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时期的代表著作，考察它们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经过研究和考察，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也不完善，它们的政权掌握在少数豪富手中，贫富悬殊的事实，引起长期的社会动荡和不安。为了避免他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后会被打倒，他幻想预防这种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衰朽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保持一块兴盛的绿洲。后来他所以提出“平均地权”、再后又提出“节制资本”等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就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弥补漏洞。

一九〇〇年六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也已开始。孙中山认为武装暴动的机会又来了，就亲自率领一批兴中会会员到香港部署起义。船到香港，香港殖民政府不许登岸，孙中山就在船上召开会议，决定以广东省新安县绿林和嘉应州三合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置的军械，在惠州三洲田起义。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孙中山说，他和日本台湾总督已有成约，起义

军到达厦门，日本政府即以武器相助。孙中山打算等起义军打到厦门时，自己就从台湾内渡，亲自到军中指挥，用日本运来的军火武装起义军，回攻广州，得手后马上组织临时政府。

十月，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受孙中山委托，率领三合会的人员六百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几次打败来攻的清军，十多天时间内，发展到两万多人，声势浩大，清军无可奈何。孙中山在台湾得到起义军的捷报，就电请日本人宫崎（音奇 qí）寅藏，将借自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运送惠州。不料这批军械尽是些废铜烂铁，全不能用。在这关键时刻，日本政府禁止对中国革命党人供给武器，又不许革命党人在台湾活动。孙中山一筹莫展，只得派人将这情况告诉郑士良。起义军血战半个多月，虽然士气旺盛，但弹药已尽，正在盼望军火，接到这个通知，非常泄气，全军两万多人，很快就瓦解了。郑士良率领一部分亲随逃回香港。

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派史坚如去广州策划响应，没有成功。史坚如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又因炸药效力不足，没有成功，自己反被逮捕杀害。至此，第二次起义又告失败。孙中山引导起义人员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上，忽视了其他起义群众的配合，更不能深入地发动群众作为自己的后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三、继起的革命团体

惠州起义后，革命形势继续发展，孙中山受到了鼓舞。他曾回忆说，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社会舆论总是把他说成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惠州起义失败后，情形不一样了，许多人都为他领导的起义没有成功而感到惋惜。这些话，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形势变化的趋向，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不但越来越被人注意，并且正在形成一股社会潮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因而继兴中会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华兴会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

光复会导源于一九〇三年中国留日学生中所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随着兴起。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也是走不通的，许多爱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出国留学。日本是学习西方有成效的国家，又离中国近，留学费用少，所以去的人逐渐增多。二十世纪初年，由原来的几百人，骤增至八千多人。这些青年知

识分子到了国外，接触到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大都对帝国主义横行中国以及清朝政府的腐朽卖国产生不满，同情国内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沙俄帝国主义乘机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直到一九〇三年初还不肯按照协议撤兵，并且强迫清朝政府与它缔结条约，企图使这种侵占合法化、永久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掀起了一个抗俄、拒俄运动。除了东北三省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武装抗击俄国侵略军外，内地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声讨沙俄帝国主义的强盗罪行。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举行集会，上书请愿，要求清朝政府出兵抵抗；上海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以蔡元培为首，通电全国，促请各界奋起拒俄。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召开大会，推派代表回国，吁请清朝政府出兵抵抗，同时组织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打算开到东三省去打击俄国侵略者。后来，日本政府以不许外国人在日本搞军事活动为理由，进行干涉。拒俄义勇队便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暗中派人回国，策划武装革命。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前，在上海的知识分子蔡元培、章炳麟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以教育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当时清朝驻日本公使蔡钧，面对留学生中日益澎湃的革命思潮，非常害怕，电请清朝政府停派留学生，又照会日本政府禁止中国学生学习陆军。中国教育会因此自行筹集资金，准备自办学校。恰好上海徐家汇的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压制言论自由，激起学潮，一百多名学生愤而退学，中国教育会就为他们创办爱国学社。不久，南京的陆师学堂也闹

学潮，一些学生退学来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壮大了爱国学社的声威。上海的张园，当时是他们经常进行演说等活动的地方。

一九〇三年冬，原军国民教育会的浙江籍留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首领蔡元培等人合作，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光复会通过会员陶成章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反抗清朝政府的方向更加明确。比起军国民教育会来，算是前进了一步。一九〇四年春，为了进一步组织会党势力，陶成章等人又起草《龙华会章程》，提出“要把土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豪富民霸占”的口号，得到了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带会党群众的欢迎，很快就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革命团体。

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时，湖南籍的留日学生黄兴、杨笃生、陈天华等人，也先后回国活动。一九〇四年初，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入会的有数百人。又设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据说能调动十多万人，愿意听从黄兴等人指挥。黄兴等人打算借助会党的力量，夺取湖南，然后号召各省起义，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经过磋商，他们定出了具体行动计划：旧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预埋大型炸弹于长沙万寿宫内皇殿的拜垫下，炸死前来祝寿的全省文武官员，乘机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五路策动响应。在长沙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军队力量为主，其他各地则以哥老会的人员为主。起义前十天机谋泄露，几个会党分子被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领导人。黄兴逃跑到上海，又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前出版的宣传革命的书刊

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来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反清，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它们的活动地区广东、两湖和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分，工商业比较发达，与外界接触频繁，到外国留学的青年比较多，新旧思想斗争也激烈，加上有“反清复明”的会党做基础，所以在革命者的活动下，很快就成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几个中心点。

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出现的同时，宣传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书刊，也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版。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制造革命舆论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当时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书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重印原有揭露清朝皇族入关时罪行的著作，如《扬州

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用以激发反清革命的民族思想。

二、大量印行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自己编写的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揭露清朝政府的腐败黑暗和媚外卖国的罪行。

三、编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有关著作，介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此外，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各省留日学生也创办了《游学译编》《大陆》《湖北学生界》《江苏》《新湖南》《浙江潮》等刊物。

影响最大的，要算陈天华、邹容、章炳麟等人的著作。在《警世钟》《猛回头》两篇著名作品里，作者陈天华运用通俗浅显的文字、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热情地歌颂中华民族的伟大，愤怒控诉清朝政府卖国和帝国主义疯狂蹂躏（音吝lln）中国人民的罪行。他大声疾呼：“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他主张“杀尽仇人方罢手”，杀退外国侵略者，清除为侵略者效劳的汉奸走狗，达到“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的革命目标。这些言论，在当时很受革命群众欢迎。邹容的《革命军》，也以文字通俗、感情丰富、思想泼辣见长。它对清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人民的罪行，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同时提出了推翻清朝统治、反对外来干涉、全国人民一律平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它号召人民和“爱新觉罗氏（清朝皇族的姓）相

驰骋（音成 chéng）于枪林弹雨中”，打倒清朝政府，再去扫荡那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这些书出版后，轰动一时。章炳麟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学者，他公开驳斥了康有为的反动保皇谬论。这时，康有为无耻地歌颂光绪皇帝的“圣德”，恶毒诬蔑革命，影响极坏。章炳麟一出马，就用非常有力的论证，驳得他体无完肤，又公开斥责光绪皇帝为五谷不分的小丑，在皇帝至上的封建社会里，这种言论就不能不使清朝政府大为震恐，因而也赢得广大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

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向清朝政府展开攻势，清朝政府一发觉就用高压手段镇压。一九〇三年，上海发生了影响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设在上海的“租界”里，本来是一个落职县官陈范所办，起初宣传改良主义，后来倾向革命。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就利用《苏报》，作为宣传机关。《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刊行后，《苏报》发表文章推荐和赞扬，又发表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呼应，因此成了清朝政府的眼中钉。清朝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查封《苏报》，逮捕章炳麟和邹容。后来邹容死于狱中，章炳麟则被判处三年徒刑。

清朝政府又列举了一大批革命书刊，下令各地严加查禁。但是，这种绞杀革命言论的卑鄙手段是徒劳的。《苏报》被封后，革命党人又办起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国民日报》，进行革命宣传。许多革命书刊越被查禁，看的人越多。浙江有个农民曹阿狗，富于革命造反精神，有人送他一本《猛回头》，他很高兴，熟读后到处演说革命道理。清朝政府把他逮捕杀害，还

出告示说,有看“逆书”《猛回头》的,杀无赦,以曹阿狗为例。告示一出,找这本书看的人更多了,乡下难于找到,就通过各种关系到上海购买。类似事例,好多地方都有。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反动派的禁止和镇压,只能走向他们要求的反面,结果是促进了人民的觉醒。辛亥革命前,革命书刊冲破重重阻力在各地传播,就是一个明证。

四、同盟会的成立

从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成立，到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产生，十年间国内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清朝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推翻卖国的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新的形势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领导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盟会的成立，适应了这种客观形势的要求，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走向高潮的标志。

正当国内革命团体纷纷出现的时候，海外的革命势力也在发展。一九〇三年冬，孙中山又到了檀香山，根据华侨中很多人加入“洪门”（又称“洪帮”或“红帮”，是清朝民间秘密组织之一）组织的具体情况，为了便于活动，他加入了洪门团体“致公堂”。一九〇四年初，他以会党首领的身分，到美洲华侨中宣传革命，受到欢迎。他亲自为美洲华侨中的致公堂改订章程，将兴中会誓词中的重要语句改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用作致公堂的宗旨。从此，“平均地权”这一重要内容，就被纳入孙中山的革命政纲。一九〇五年初，孙中山由美洲到欧洲，在中国留欧学生中创立革命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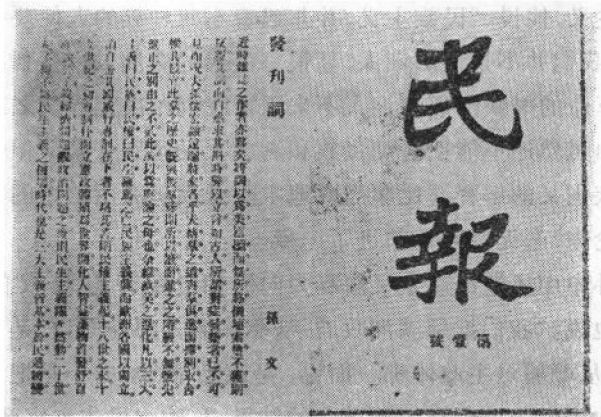
国内外革命团体成批地出现，反映了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同时也给革命党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即怎样把分散的革命小团体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领导革命前进。这年七月，孙中山来到日本，根据这个客观形势的要求，同华兴会代表黄兴、宋教仁等人商量合组革命政党的问题。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中，有些人主张合并，也有些人反对合并。孙中山向大家解释说，中国现在不必怕被各国瓜分，只怕自己内部不统一，这一省想起事，那一省也想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必将造成二十多个地方政权之间的斗争，各国乘机干涉，那就一定要亡国。因此，各革命团体之间，“总以相互联络为要”。

孙中山的主张得到黄兴等人赞同，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等团体，成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七月三十日在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合会，出席的有各革命团体代表七十多人。会上决定，建立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作为政治纲领。

八月十三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欢迎孙中山，到会的有一千三百多人，会场内外、台阶上下都挤满了人，盛况空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痛斥改良派“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可民主共和”的谬论，大大地鼓舞了革命派的斗志，革命旗帜大张。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会员有几百人，通过了同盟会的《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即《同盟会宣言》），推选孙中山为总理。根据

《总章》，同盟会设领导机构同盟会总部于日本东京，总部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由黄兴担任执行部庶务长，代表孙中山主持总部的日常工作。

十一月，同盟会总部创设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又把他的十六个字纲领进一步阐发为“民族”“民



《民报》和《民报发刊词》

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中心内容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所谓“民权主义”，中心内容就是“创建民国”；所谓“民生主义”，中心内容就是“平均地权”。以上四句话、三大主义，是孙中山社会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他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随后，同盟会总部又编制了一套《革命方略》，共有《军政府宣言》《对外宣言》等八个文件，内容包括同盟会总的施政纲

要、对外政策，和各地武装起义的具体政策方针等。

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承认为同盟会的指导思想，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比以前成熟了。

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但抛弃了旧有反满口号中的种族复仇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孙中山虽然还不能把清朝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但他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比起当时地主阶级反满派所散布的种族革命论来，毫无疑问是前进了一步。

孙中山还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向清朝贵族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这样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在这里，孙中山把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结合起来，为日后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然纯粹是空想，但它以“平均地权”为主，触及了反封建的重要内容。

第二，同盟会成立后，以统一的革命政党代替原来分散的革命小团体，革命派的团结比以前扩大了，力量加强了。

在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都带有较深的旧式会党的痕迹，地区局限比较大，一般都没有正

式的政治纲领和比较完备的组织形式，不仅各组织间自立门户，就是一个组织内部步调也不一致。同盟会成立后，改变了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

孙中山和他所创立的兴中会，长期以来主要活动范围在广东、香港以及海外华侨中，与内地人民很少联系。同盟会成立后，国内会员大量增加，联系相对地加强。而且同盟会所增加的会员，又多数是各省的留学生和他们所串联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但就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音仇 chóu）。他们年轻、热情，不满于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有比较大的革命性，他们入会，也就增强了同盟会的力量。

然而同盟会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之间松懈的联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表面上被接受为指导思想，许多人对它仍然有所保留。例如，原华兴会等团体中的某些人，本来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们接受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思想，却反对他“平均地权”的主张，因而被称为“二民主义者”。原光复会中有些人，较多地强调反满，对于其他问题就不甚关切，当时又被人们讥讽为“一民主义者”。政见上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不稳固。过了不久，同盟会中就派生出一个“共进会”来。共进会虽然继续打着同盟会的旗号，但在宣传中，却把“平均地权”改作意义模糊的“平均人权”，而光复会则一直保持独树一帜的活动，这就为同盟会预伏下日后分裂的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它所宣布的纲领本身存在严重的

缺陷。

第一，同盟会民族主义的锋芒，只是针对清朝贵族为首的统治，而没有把帝国主义包括在内，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一个最主要的矛盾，即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尽管象孙中山和陈天华等人，具有反帝爱国的思想，但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们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可能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把反帝爱国思想化作实际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同盟会中一部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会员，历来对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心存异议，经过他们反复渲染，本来居于次要地位的满、汉矛盾，被夸大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大大地冲淡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内容。从同盟会所发布的《对外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标榜的民族主义，还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存在很大幻想。

这个宣言共分七条，前三条是：

- 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 二、“偿款(赔款)外债，照旧承担。”
-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这是同盟会的外交总方针。很明显，他们所以发表这个宣言，目的就是向帝国主义讨好。他们向帝国主义明确宣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算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用以换取帝国主义的中立和支持。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它的命就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对于这个革命，帝国主义怎么会保持中立并给

予支持呢？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革命的不彻底性，首先在他们的政纲中暴露出来了。

第二，孙中山虽然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向清朝贵族夺取政权的斗争，但由于阶级局限，他不可能把清朝贵族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所以在实际贯彻中，就被某些人阐释为单纯的反满。这种倾向，大大地削弱了辛亥革命反封建的意义。从同盟会所发布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又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标榜的民权主义，是多么缺乏实际的政治内容，他们对于汉族的官僚地主、封建军阀，又寄予多么大的希望。

这个布告一开头，就对为清朝政府卖命的汉族官僚、军阀说：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讎（音仇 chóu）”。但是，我们和你们都受清朝政府的压制，只要你们改变“隐忍未发”的状态，起来反抗，我们和你们就可以“离仇讎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些论调，与其说是为了争取汉族的官僚、军阀，倒不如说是在革命队伍中散布对于这些反动人物的幻想。加上他们在《略地规则》中规定，起义后的地方秩序，应由当地的地主、绅士来维持，这就更加表明了他们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性。

第三，同盟会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是他们却又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反对广大农民起来革命，妄想采用所谓“核定地价”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个办法，就是由革命政府出面，把每块土地核定价格，现有的地价仍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因为社会进步所增加的地价，才归国家所有，“为国民所共享”，也就是为资产阶级所共享，广大劳

动农民是没有份的。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惧怕农民群众用暴力摧毁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也无法造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真正领导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从事反封建的斗争。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五、和改良派作斗争

同盟会成立的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仍在拼命活动。他们利用前一阶段的政治影响，宣传保皇，蛊（音古 gǔ）惑人心，成为革命的劲敌。为了扫除障碍，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改良派作了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改良派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改良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一部分兴中会会员曾想和他们合作，但被他们拒绝。一八九七年日本横滨华侨想办学校，托孙中山从国内代请教员，兴中会的陈少白介绍他们到上海找梁启超，恰好改良派想向海外发展，就派康有为的学生徐勤等人到横滨去。这所学校本来经孙中山定名为“中西学校”，徐勤等人去后，就按照康有为的意思，改名为“大同学校”。

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等人的意见，下诏变法。改良派一时得势，深怕徐勤等人在日本与革命派来往，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就在“大同学校”里写上“不得招待孙逸仙”字样，拒绝孙中山进这所学校。本来由革命派创办的学校，从此被

改良派夺去，成了改良派在海外活动的机关。

一八九八年九月，西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在英、日帝国主义分子的掩护下，逃亡日本。孙中山想借此机会和他们合作，经过多次谈判，都没有结果。这时，改良派在政变的刺激下，已经分化。有些人赞成革命，参加了兴中会，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仍然死抱住失败了了的改良主义不放，成了顽固的“保皇党”。

一八九九年康有为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创设保皇会。梁启超却变换手法，在日本办《清议报》，一面歌颂光绪皇帝，攻击西太后；一面发表一些反清文章，装得很激烈。十月，又在日本设高等大同学校，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做教材。不但一般人受他迷惑，连孙中山也以为他倾向革命，准备和他合组一个政党。

梁启超所以做出这种“革命”姿态，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形势有了变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抬头了，不仅同国内的会党有了联系，在国外檀香山、日本等地，革命力量也有所发展。为了借重革命派的阵地，为自己积蓄力量，梁启超之流就采取了假革命、真保皇的偷梁换柱的做法。而这时的革命派，对他们仍然没有警惕。一八九九年，革命派把长江流域的一些会党首领介绍给他们。他们回国后，很快把这些会党夺了过去，另建山堂，康有为做“大龙头”，梁启超做“副龙头”。一九〇〇年，孙中山又亲自把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包括他哥哥在内，都介绍给梁启超。梁到檀香山后，就利用孙中山和他哥哥孙眉的名义，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

子下，拚命发展保皇会。很多兴中会会员都被挖了过去，甚至连孙中山的哥哥，也成了保皇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

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到檀香山，发现保皇会势力很盛，知道上了梁启超的当，于是着手整顿和发展革命组织，并亲自写《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等文章，对他们的欺骗宣传进行揭露。孙中山还指示各地兴中会组织，创办和改组有关报刊，对保皇派进行批判。于是，檀香山有《民生日报》与改良派的《新中国报》对抗，旧金山（美国）有《大同报》和改良派的《文兴报》对抗。此后，广州、上海、天津、香港和新加坡、暹罗、日本等地，也都有批判改良派的革命报刊陆续发行。

革命派对于改良派的斗争达到高潮，是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

同盟会成立时，决定接收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机关报。九月，同盟会总部研究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称《民报》，十一月正式出版。

《民报》出版后，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就对改良派宣战。此后，又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理，刊登有关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文章和报道，颂扬他们“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表示要把这种精神应用到中国革命中来。所以《民报》每一期出版，都被国内的先进的人们争相传诵，往往一版再版，供不应求。

这时，改良派深怕清朝政府被打垮，因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表示了极大仇恨。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里，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

第二义，与革命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指革命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这就清楚地暴露了他们对于清朝政府小骂大帮忙，欺骗人民，抵制革命的反动立场。正因为如此，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一场论战，已不可避免。

一九〇六年，《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章炳麟在会上宣读祝词，反复强调民族革命和创建民国的宗旨，孙中山也在会上演说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加抨击，论战更加激烈。

改良派制造种种理由，替清朝政府辩护，反对革命派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主张，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推翻清朝政府。

：改良派说，汉人在法律地位、政治生活方面，已经和满人完全平等，民族革命根本没有必要。

改良派标榜自己一向主张政治革命，但是又说，政治革命应该有“正当”的方针，即“劝告”政府改良政治，“要求”政府实行立宪。

改良派说，不好的人民，才“造出”不好的政府，如果政府去掉专制压力，没有好的人民，政治反而更坏，所以问题不在政府恶劣，而在人民恶劣。

改良派叫嚷：政治改革只能“拾级而升”，“断难躐等”。胡说中国人没有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只能实行开明专制，首先培养人民的“公益心”和“自治秩序”，然后才能得到皇帝恩赐的君主立宪。

改良派还教训革命派说，如果硬要在中国搞武装革命，硬要实行民主政治，那就必然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破坏社会秩序，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使国家陷于被瓜分和灭亡的险境。

对于改良派的谣言和诡辩，革命派进行了斗争。

革命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清朝政府一贯奉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清朝政府的统治，是民族的牢狱、民主的障碍，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完全必要。

革命派撕下了改良派“政治革命”的伪装，指出他们所谓的“正当”方针，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为清朝政府辩护，反对革命。革命派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历史表明，不搞暴力革命，不借助兵力，就不可能立宪，改良派鼓吹用磕头、请愿的办法实行“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全是骗术，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清朝政府的“野蛮专制政体”。

革命派认为后来可以居上，过若干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不难举西人文明而尽有之”，批判了改良派“断难躐等”的反动思想。他们还根据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理论，驳斥了改良派散布的“人民恶劣”的谬论。他们说只要去掉君主专制对于人民的钳制，人民就一定会自动起来，为民主权利而斗争。他们利用戊戌变法失败的事实，说明在当时条件下，清朝政府已经恶劣透顶，一点权利也不肯放弃，可是对于这样顽固恶劣的政府，改良派还为它解脱，教唆它实行什么君主立宪，可见改良派与清朝政府本来就是一丘之貉！

因此，革命派公开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号召用强力打垮

清朝政府。他们说清朝政府早已充当洋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正是为避免国家被瓜分、被灭亡，才要打倒这样的卖国政府，而改良派却千方百计维护它的统治，可见他们所标榜的“爱国”，实际上是“爱清”，他们和清朝政府一样，都是出卖祖国、出卖人民的卖国贼。

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了好几年，革命派越来越多地赢得声誉，改良派则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唾骂。一九〇七年，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为清朝政府的假立宪推波助澜。政闻社开成立大会时，到会群众一千多人，其中改良派只有二百多人，革命党和拥护革命的群众，就有一千多人。因此梁启超刚刚登台，就被台下群众斥责，甚至有许多人拥上台去打他，弄得他狼狈不堪，只得从后台溜走。这件事，很形象地表明了改良派的衰落和革命势力的兴盛，所以自此之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胜利是不彻底的。在反帝反封建两个根本问题上，他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动摇妥协性。

在对待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上，革命派不敢正面答复改良派的挑战。他们一再强调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在华均势，不会灭亡中国，只要把革命限制在“排满”范围内，不去触动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帝国主义就没有理由干涉中国的革命。

在对待土地制度和对待群众态度的问题上，革命派也同样表现出自己的弱点。虽然革命派驳斥了改良派指控“平均地权”将“妨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谬论，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

没有把“平均地权”看作一个行动纲领，他们根本不愿意彻底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在与改良派论战中，他们不是着眼于发动群众，而是害怕群众，力图束缚群众的手脚。他们说只要把群众的“自然暴动”加以改良，使它成为“有秩序的革命”，就不会搞乱社会秩序，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就不会招致被瓜分的危险。这种论调，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对待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六、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时，就号召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一九〇六年春，设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派遣留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当时长江流域因水灾造成饥荒，湖南的灾情严重。地主豪商乘机哄抬米价，靠近湖南的安源矿工，更加无法生活，反抗情绪愈益炽烈。安源属于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的浏（音刘 liú）阳、醴（音里 lì）陵邻近。浏阳和醴陵都是会党势力很盛的地方，一九〇四年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就是以这里的会党做基础的。一九〇五年会党首领马福益，被清朝政府逮捕杀害，复仇的怒火越烧越旺，会党势力很快就在安源矿工中得到发展。

刘道一、蔡绍南回到长沙后，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大家认为要夺取长沙，必须运动军队和会党同时起义。会议决定，刘道一留在长沙，负责全盘工作；蔡绍南去萍乡，运动萍乡和附近各县的会党。

蔡绍南到萍乡后，就在会党中宣传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把当地两支较大的会派，合并为一个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洪江会发展很快，几个月时间，会员就增加到几万人，安

源矿工中很多人都参加了洪江会。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日，蔡绍南、龚春台等人在萍乡的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讨论起义时间，会上发生了争执。四日清晨，会党中激进分子廖叔保不满于无休止的争论，跑回浏阳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起“汉”字大旗，宣布起义，迫使蔡绍南、龚春台等主要负责人，只得用总机关名义通知各路响应。酝酿已久的萍、浏、醴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推龚春台为都督，发布檄（音习 xí）文，声称不但要推翻清朝贵族的统治，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而且还要“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

洪江会起义后，浏阳东部与北部的另一会派洪福会，也在姜守旦率领下宣布起义，自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醴陵的会众，也在李香阁率领下宣布起义。安源本来定为起义军根据地，但是起义前会党活动频繁，已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清朝政府调遣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军队前来镇压，安源煤矿也有清军驻扎，矿工被严密封锁，不得与外界来往。许多矿工通过斗争，仍然参加到起义军中来。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十几天内起义军扩充到三万多人，控制了附近四、五个县。参加起义的工人和农民，凭着手中极简单的武器，一再打败清军，缴得枪支一千多杆，形势发展很快。可惜在这时期内，没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会员蔡绍南，虽然参加了领导，可是他既没有作战经验，又不能与群众结合，领导无方，前线后方各行其是，造成混乱，以

致在强大的反革命力量进攻下，被各个击破。起义军本身目标不一，一称“中华国民军”，一称“中华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革命旗号不一，互不统属，削弱了战斗力，也是这次起义失败的一个原因。

萍、浏、醴大起义，本来就不是同盟会总部有计划组织的。起义爆发后，刘道一拍发的密电，全被长沙电讯局扣留，同盟会总部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后来从日本报纸上得到一点消息，马上派人回国策应。但他们回国后，起义已经失败，刘道一、蔡绍南已经牺牲。清朝政府镇压了起义，又在各省清乡，搜捕革命党人。同盟会派遣回国的人员，有的被捕杀害，有的长期监禁，也有人成了出卖革命的可耻叛徒。

在清乡中，清朝政府查明领导起义的机关设在东京，就请求日本政府迫令孙中山离境。一九〇七年初，孙中山到了越南河内，派人分头到广东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钦州、廉州在今广西境内）发动起义。潮州、惠州比较靠近，本来打算同时发动，但因潮州黄冈革命党人机谋泄露，仓促起事，战斗失败。惠州革命党人得到消息，马上响应，但是已经来不及，自己反而成了孤军，奋战十多天后，终于因为众寡不敌而失败。

惠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又在钦州发动起义，攻下防城，准备夺取南宁，向广西方面发展。当时钦州、廉州的群众正在开展抗捐斗争，多次打败清朝政府的军队，对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是有力的配合。革命党人和抗捐的群众已有联系，但他们不是去组织群众，扩大斗争，而是把希望寄托于清军将领郭人漳的反正，结果受到郭人漳的捉弄。郭人漳一方面对革

命军表示“好感”，麻痹群众，在猝不及防中，镇压了群众的抗捐斗争；另一方面又趁革命军脱离群众并为幻想所陶醉，袭击防城，使革命军腹背受敌。革命军最后不得不退入粤、桂两省交界的十万大山，起义宣告失败。

防城起义失败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又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发动起义，夺取炮台，苦战七昼夜，又被迫退出。一九〇八年三月，黄兴再率一支以华侨中革命分子为主力的短枪队两百多人，进入两广交界的钦州、廉州、上思一带，战斗四十多天，还是打不开局面，再次败退下来。同年四月，从镇南关退下来的起义队伍，转到云南边境，攻克河口，随即遭到清军围攻，退入越南境内。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接受清朝政府的请求，把起义队伍全部解除武装，押送到新加坡驱散。同盟会在西南边境经营了两年多的武装斗争，全部被破坏。

当同盟会在西南边境起义时，光复会也在安庆两次举行起义。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警察学堂数十人起义于安庆；一九〇八年，安徽巡防营炮队队长熊成基，又领导军队暴动。两次起义都因众寡悬殊，没能坚持多久就失败了。徐锡麟是光复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时，他强调反满，与孙中山宗旨不合，坚持不愿参加。后来女革命党人秋瑾（音仅 jīn）参加了同盟会，被指派为同盟会浙江支部的负责人。一九〇六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又经徐锡麟介绍参加了光复会，从此秋瑾就以双重身份与徐锡麟联系。徐锡麟安庆起义时，秋瑾正在浙江绍兴主持大通学

堂，作为发动武装斗争的革命机关。秋瑾本来与徐锡麟约定，安庆起义，浙江响应。安庆起义很快遭到镇压，浙江还来不及准备，清军已经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也因此被捕牺牲。

几次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领导人总结经验，认为过去起义所以失败，原因是地点选择太偏僻，运送枪械、弹药有困难；依靠会党作主力，战斗力也不强。因此，一九〇九年，黄兴受孙中山委托，设同盟会南方支部于香港，着重在广东新军中活动，准备利用新军的力量，在广州起义。新军是清朝末年用资本主义国家练兵方法训练出来、并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其中有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经过革命党人活动，新军中不少人倾向革命，有的参加了同盟会。一九一〇年二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率领新军三千人起义于广州，遭到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新军起义又失败了。

新军起义失败后，很多革命党人泄气了。这时，孙中山从美洲到了南洋，在槟榔屿（在马来亚西北部）召开革命党人会议，鼓舞大家的斗志。经过研究，决定再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募捐，派人到各资本主义国家去购买武器。同盟会总部又从国内各省、南洋华侨以及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挑选了八百人，组成一支敢死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同时联络新军、防营、会党响应。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决定于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动起义。

四月二十三日，黄兴由香港秘密来到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指挥部，部署起义。正在这关键时刻，负责运送枪械的人员叛变，不仅一部分枪械不能到手，而且两广总督张鸣

岐（音其 qí）得到消息，收缴了倾向革命的新军二标的枪支，飞调巡防兵三营，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形势非常严重。这时，同盟会中一部分不坚定分子，要求改期举事，黄兴等人坚持不同意，结果放弃了原来十路进兵的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

四月二十七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领革命党人一百多人，直奔总督衙门，但攻进督署后，总督张鸣岐已经逃跑了。起义军刚出督署后门，就和水师提督李准的部队遭遇，展开激战。很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最后化装逃走。起义失败后，找出在战斗中牺牲的七十二具尸体，合葬在广州城外的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又叫做黄花岗起义。

武昌起义前，各地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共有十次，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由境外运送军火和起义人员，到达指定地点发动起义，如一九〇八年的云南河口起义，一九一一年年的黄花岗起义；第二，单纯的军队起义，如一九〇八年熊成基安庆起义，一九一〇年黄兴等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第三，利用会党力量和借助于人民反饥饿与抗捐暴动起事，如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和一九〇七年的潮、惠、钦、廉、防城等各次起义。以上三类起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采取广泛发动群众的方针，只是进行单纯军事冒险，所以一经敌人调集兵力反扑，就形成众寡悬殊的不利形势。他们虽然也和会党有联系，但只是利用会党做单纯军事冒险的工具，很少对会党进行改造，更没有通过会党去发动群众。加上一部分会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注意联络

会党,也就更加脱离广大工农群众。

革命党人屡起屡败,一部分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竭力倡导暗杀,想杀死几个满汉重臣,侥幸取得胜利。《民报》最后几期,也连篇累牍(音读 dú)地鼓吹暗杀行动,暗杀之风大盛一时。一九一〇年,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投机分子汪精卫,就抱着这种心理,去北京参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音丰 fēng),结果行踪暴露,被捕入狱。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看不到前途的光明,对同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怨言,使团结处于破裂状态,这就更加削弱了同盟会对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革命运动的领导。

七、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尽管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沮丧、动摇，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潮流，仍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前进。

毛主席说：“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最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①

中国工人阶级从产生起，就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

中国工人阶级，发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它不但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大些。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外国在华开办厂矿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与全国人口比较，这个数字还很小。但是，工人阶级代表先进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六页。

的生产力，人口集中，又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此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战斗力也特别强。

一八八四年，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在酝酿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九月，法国军舰因为侵略中国台湾和福建受伤，开到香港修理。香港中国造船工人罢工拒绝。法国商船到香港，水上驳运工人不替它卸货，搬运工人也罢工响应。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派兵镇压，逮捕罢工群众三十人，打死罢工工人一人。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即和他们格斗，英国侵略者受伤的也有十多人。惨案发生后，香港中国工人怒气冲天，纷纷罢工罢市，连舂米工人也自动放假，事态很快扩展到九龙，迫使英国侵略者只得释放被捕的中国工人。法国侵略者更是无可奈何，在香港连饭也吃不成，只好灰溜溜地把船开到越南的西贡去采办食物。当时孙中山正在香港的皇仁书院读书，看到这种情形，受到很大鼓舞。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激化，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也更为频繁了。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年，仅上海一个城市，罢工斗争就出现九十多次。一八九七年在上海“租界”里，曾经爆发五千小车工人抗捐罢工斗争。抗捐群众一度形成暴动，以棍棒、扁担、砖瓦、石头作武器，和镇压他们的巡捕相厮杀。这次暴动虽然被英、美帝国主义水兵镇压下去，但是却显示了上海第一代交通工人的战斗意志。

在上海工人开展斗争的同时，另一个工业中心武汉，也沸腾起来。一九〇五年汉口铜货工人三千多人，为反对资本家

克扣工资而罢工。一九〇七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定额而罢工。一九〇九年汉口外国资本家经营的砖茶厂，八、九千工人同盟罢工，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厂方无理拒绝，工人“聚众数千人”，将工头痛打，几乎形成暴动。一九一一年一月，汉口英“租界”巡捕房侦探无理踢死中国人力车工人，引起公愤。第二天一千多人力车工人齐集英国巡捕房前，要求惩办凶手。英国领事竟然命令英军开枪，杀死中国工人十多人。汉口清军统制张彪、江海关道齐耀珊，率领清军五千人赶到现场，喝令群众退去。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打伤了齐耀珊的左眼。随后，武汉各界几万人集会，一致抗议英国侵略者野蛮暴行，并愤怒声讨清朝政府的卖国罪行。为了保护外国主子的安全，张彪亲自驻扎英“租界”，每天派军队在“租界”巡逻，所有“洋街”及华界各教堂均派兵保护，硬把风潮镇压下去。清朝统治者愈是公开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就愈是自绝于人民。武汉三镇革命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当然，辛亥革命前，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醒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工人群众的斗争，还是自发的分散的，当时他们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革命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还是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广大农民继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之后，又自发地举起反洋教斗争的旗帜。这种斗争，后来发展成为对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的义和团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又一次革命高潮。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所

领导的民主革命蓬勃兴起，反洋教斗争退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八年间，“焚教堂，戕（音 qiāng）教士”的事件，仍然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一九〇一年春，直隶广宗人景廷宾，为反对外国教士借口赔偿教堂和教士的“损失”勒索赔款，两次聚众抗议。一九〇二年二月，清朝政府派兵镇压，景廷宾自称“龙团大元帅”，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掀起了冀、鲁、豫平原二十四州县二十多万农民大起义，向帝国主义的教会、教士以及清朝政府的贪官污吏进攻，一度袭破威县和广宗县城，包围了冀州、南宫、枣强、隆平、宁晋、柏乡等县，革命声威大振，反革命闻风丧胆。在这前后，四川的会党以“灭清剿洋兴汉”为旗帜，活跃于川东一带；湖南邵阳人贺金声，也组织“大汉灭洋军”，宣布起义。此后，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八年间，仅《东方杂志》就报道了类似事件三十五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反洋教斗争，或者公开提出了“反清灭洋”一类口号，或者从事被清朝政府称为“仇教戕官”的活动。这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自发地把反帝和反封建两大任务联系起来。

农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形式之一，是抗捐抗税。抗捐抗税运动，本来是农民反抗压迫的传统形式，二十世纪初年再度呈现高潮，河南祥符、江苏泰州、广西梧州、山东郛（音运 yùn）城等地，都先后发生群众捣毁衙门、税卡的暴动。一九〇四年，江西乐平人民反抗抽取“靛（音电 diàn）捐”，坚持半年，一度占领了县城，夺取枪枝，将县署、盐卡、厘卡、统捐局以及外国教堂全

部捣毁，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也给外国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一九一〇年，山东莱阳的抗捐运动规模更大。五、六万起义群众在联庄会首领曲诗文的领导下，四出捕捉一贯横行乡里、用办“新政”名义强征暴敛（音练 liǎn）的土豪劣绅。山东巡抚得到消息，调集重兵前往镇压，杀死起义群众很多人，烧毁民房一千多间。清朝政府的残酷屠杀政策，只能激起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莱阳人民反抗的怒火，很快就延烧到附近的几个县。

与抗捐抗税斗争同时，长江流域的抢米事件又风起云涌。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间，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许多州县，都发生饥民暴动，大小共九十多起。影响较大的，是一九一〇年长沙的抢米风潮。一九〇九年湖南遭受水灾，粮食歉收，全省饥民有十多人，而官绅、富商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很多城郊农民、手工业工人、铁路工人、城市居民等，无法生活。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市一个挑水工人以一天的收入买不到一升米，忧愤交集，全家投水自杀，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捣毁碓（音对 duì）房、米店、钱庄、税卡以及外国领事馆、洋行、教堂等，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形成了震动全国的革命风暴，直接威胁到清朝政府的统治。

在工农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城市居民和一部分民族资本家，也加入斗争行列。以一九〇五年为例，这一年共发生群众性的反抗斗争八十多次，市民和商人罢市就有二十多次。其中抵制美货运动，更形成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给美帝国主义

以有力的打击。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部的许多矿山、铁路、城市建筑，都是中国工人流血、流汗建设起来的。美国资本家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不惜用欺骗、拐带、绑架等卑鄙手段，把大批华工弄到美国去。等到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危机，他们为了转移美国工人的斗争目标，又恶毒地宣传中国工人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到处煽起排华事件，制造惨案。在一个矿山里，美国统治阶级一次就屠杀了起来反抗的中国工人两万多人。美国政府这种残暴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仇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美国政府胁迫清朝政府签订的虐待华工条约期满，中国各地人民和海外侨胞，纷纷要求废约改订。美国政府置之不理。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一部分受美货排挤的民族资产阶级，乘机通电全国，呼吁抵制美货，很快得到全国大小城镇和一部分华侨商务团体的响应，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美运动。这次运动，在工农群众的坚持下，给予美帝国主义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显著减少。

在反美爱国运动的激荡下，各地收回铁路和矿权的斗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山西人民收回被英商霸占的煤铁矿主权的斗争，最早开始于一八九八年，中间经过多次波折，终于在一九〇七年赶走了英国侵略者，设立山西保晋矿务公司，自行开采。两年后，安徽人民也将铜官山的煤矿从英商手中夺回。人民收回矿权和路权，清朝政府却继续将它出卖，因而这场斗争必然形成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八、清朝政府的假立宪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民主革命的声浪，越来越严重地威胁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清朝统治者眼看野蛮的屠杀政策，不能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就大肆进行和平欺骗，妄图麻痹人民。清朝末年的假立宪，就是这种和平麻痹政策的产物。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朝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镇压后，一九〇一年，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进一步出卖祖国、出卖人民的《辛丑和约》，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打倒卖国的清朝政府，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一部分中小地主在内的共同呼声。为了缓和人民群众的愤激情绪，被帝国主义赶出北京、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赶忙假惺惺地下诏“罪己”，又设立了一个“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从此拉开了和平欺骗政策的帷幕。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他们所办的“新政”不下几十项，但主要内容超不出“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九个字，只是拾起在戊戌（音勿需 wùxū）政变时被他们自己取消的新政中的几个项目，用来欺骗人民罢了。

尽管清朝政府大吹大擂地举办“新政”，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还是飞速向前发展。在革命派的政治攻势和舆

论压力下，已经堕落到“保皇党”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首先感到恐惧和不安，特别是他们的首领康有为、梁启超之流，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再恳请清朝统治者赶快实行君主立宪，用以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

改良派的主张，得到国内一部分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官僚的响应。这部分人，因此就被人们称为立宪派。

一九〇三年，江苏的张謇（音简 jiǎn）、浙江的汤寿潜（音前 qián）等人，已经开始预谋立宪。一九〇四年，他们又勾结一部分清朝政府的地方长官如两江总督魏光燾（音滔 tāo）、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希望由他们出面，奏请清朝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俄国，立宪派便趁机大造舆论。他们说日本所以胜利，就是因为实行君主立宪；俄国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实行沙皇专制。专制的结果，不但与日本打仗要失败，还要招致俄国本身的革命。所以要国家变强，要抵制革命，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君主立宪。

在立宪派的策动下，一九〇五年清朝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要求改革政体。接着两江总督周馥（音复 fú）、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也附和孙宝琦的议论。这些汉族地主官僚所以对君主立宪表示兴趣，根本原因就是对于少数皇族亲贵把持朝政不满，希望通过立宪，全部或部分地取代他们的地位。

在革命形势逼迫下，西太后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西太后说，如果经过考察，立宪真正能使“清朝基础永远巩固”，“革命之说自归消灭”，就决计仿行

宪政。

五大臣出洋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宪派欣喜若狂，一再惊呼“伟哉此举”！为了抗击清朝政府的立宪骗局，革命党人吴樾（音月 yuè）怀里揣了一颗炸弹，跑到北京车站，寻着出洋的五大臣，要和他们拚死。刚一上车，炸弹就因人群拥挤而爆炸，五大臣中只有两人受了轻伤，吴樾自己却在爆炸中牺牲。

一九〇六年五大臣回国，向清朝政府奏请立宪。载泽还向西太后上了一个密摺，说实行宪政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音迷 mi）”三大好处；而且宣布了立宪，还可以暂不实行，象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十四年宣布立宪，二十二年才召开国会，中间有八、九年时间可作缓冲。西太后分别召见出洋大臣多次，又召开“御前会议”反复商讨，认为假立宪对于巩固清朝政府的统治确实有好处，便于九月一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假立宪的骗局正式开场。

清朝政府颁发的预备立宪“诏书”，清楚地说明：世界上决没有任何反动统治阶级，会自动放弃手中一丝一毫政治权力。

“诏书”说，清朝政府预备立宪的精神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制度还不完备，人民还没有知识，不能马上实行宪政，需要首先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再过若干年，察看情形，才能确定立宪期限。在这时期内，天下的“臣民”都必须“忠君爱国”、尊崇秩序、保守和平、养成立宪国民的“资格”。清朝政府的意思很清楚，在遥远的将

来它可以给人民一纸宪法，但要以人民不反对它为前提；如果反对它，那就是“犯上作乱”，就失去了作立宪国民的“资格”，不但宪法得不到，还要受到更加残酷的镇压。所以这份“诏书”，完全是一纸欺骗人民的空头支票。

清朝政府的假立宪，得到国内外立宪派的拥护。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康有为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公告，通知各地保皇会在一九〇七年元旦，改为“国民宪政会”，作为推动立宪的政治团体。梁启超也在日本东京创设“政闻社”，发表宣言，制订纲领，表示拥护清朝政府的立宪主张，派人回国张罗奔走。但是，不管康、梁之流怎样善于讨好卖乖，西太后仍然没有抛弃戊戌变法时期的宿怨，说他们“保皇上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下令严拿康、梁党徒，绝对不许他们抛头露面。康、梁之流打不开局面，国内立宪派如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音凯 kǎi）等人，就代替了他们的地位。这些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勾结一部分地方官绅，分别在江浙、两湖和广东等地，组成“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筹备公会”、“宪政公会”、“自治会”等名目不同的团体，为清朝政府的假立宪摇旗呐喊。

一九〇八年，以江苏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发起向清朝政府请愿。张謇是清朝的状元，戊戌变法时倾向维新，以经营纺织、面粉企业成为大资本家。这时，他俨然是国内立宪派的总头目，邀约各省立宪派代表齐集北京，上书清朝政府，要求速开国会。而清朝政府与立宪派之间，有勾结也有争斗。所以勾结，是因为他们都想借立宪骗局来抵制革命；所以争

斗，是因为他们之间也有利害冲突。在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对清朝政府中的顽固势力稍加限制，以便挤身到清朝政权中去；而清朝皇族中的顽固分子，不仅不允许有任何损害他们权力的改变，反而企图借立宪之名来集权皇室，用以排除汉族地主官僚势力。同床异梦，于是一场狗咬狗之争，就势不可免了。

正当清朝政府和立宪派明争暗斗的时候，群众抗暴斗争的怒潮，配合着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形成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洪峰，直向清朝政府冲来。清朝政府中一些当权人物，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一些原来非常顽固的人，这时也感到“欲弭革命，舍立宪别无良策”了。他们决心拉拢立宪派，以发挥其反革命同盟军的作用。一九〇八年，清朝政府颁布了一个《各省谘(音资 zī)议局章程》。后来，又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从这年起，以九年为预备期，九年以后正式实行宪政。原来遥遥无期的“预备立宪”，这时算是有了期限。但是，这份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权力十四条，把封建帝王的所有权力都写了上去，又附臣民义务九条，包括纳税、当兵等种种义务。这就清楚地说明，清朝政府借立宪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所谓预备立宪，完全是他们反革命的护身符。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三岁娃娃溥(音普 pǔ)仪登上了皇帝宝座，改明年(一九〇九年)为“宣统元年”，由他的父亲载沣任摄政王，代管国家政权。载沣掌握政权后，一面继续扮演假立宪的丑剧，一面又步步收回权力，削夺汉族军阀、地主的职权。他们害怕袁世凯实力强大，

对皇室不利，说他脚有毛病，叫他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病”，梦想用集权皇室的办法，来挽救清朝行将灭亡的命运。

清朝统治集团这样倒行逆施，使立宪派受到很大刺激。立宪派对于《钦定宪法大纲》早就不满意，尤其不满意九年预备期，怕拖延久了会有变卦，革命风潮无法平息。加上袁世凯等人的职权被削夺，兔死狐悲，更使他们感到自己政治前途渺茫。他们决计挣扎一番。于是，再经张謇倡议，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于一九一〇年二月北上，要求清朝政府速开国会，组织内阁，可是十次上书均被拒绝。立宪派与清朝政府之间的裂痕，再度显露出来。

一九一〇年十月，清朝政府成立中央资政院，一些立宪派代表被选为议员，扩大了立宪派的活动阵地。各省立宪派乘此机会联合起来，串通一部分总督、巡抚出面支持，再次向清朝政府请愿。清朝统治集团不但不肯让步，反而杀鸡给猴子看，将东三省的代表押解回籍，又将直隶省一名议员发往新疆充军，表明他们既不愿开放政权，更不允许地方官僚借端扩大自己的权势。清朝政府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扩大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朝政府为了实现先期组成责任内阁的诺言，下诏改革官制，发表内阁人选。内阁总理、协理、各部大臣十三人中，满族贵族八人，蒙古贵族一人，汉族官僚四人。这种排斥汉族地主官僚势力的皇族集权内阁，更使立宪派失望。为了对付革命，他们仍然敦促清朝政府改变这种容易招致人们反对的做法。七月间，各省谘议局再次上书请求撤销皇族内阁，又被清朝政府拒绝。立宪派本来希望在内阁中取

得一席之地，至此绝望了，因而以资政院议员为骨干，成立了“宪友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三个近似政党的团体，准备一面与清朝政府继续纠缠，一面投机革命。

清朝政府的假立宪，本来是想拉拢立宪派反对革命，以维护反动统治。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不仅没有削弱革命势力，倒进一步暴露了自己，又与立宪派闹成了僵局，众叛亲离，更加孤立。立宪派本来是清朝政府的应声虫，但因为与清朝政府之间存在那么一点矛盾，勾结之外，还有那么一点争斗，使他们得以蒙蔽一部分人，捞到一笔政治资本。武昌起义后，他们就凭这点资本，钻进革命队伍内部从事破坏。辛亥革命的失败，他们这批蠢(音度 dù)虫的“挖心战术”是起了作用的。

九、铁路风潮

清朝政府所以那么气势汹汹地一再拒绝立宪派的要求，是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清朝皇族内阁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他们在“铁路国有”的幌子下，一手向地方收回铁路主权，另一手就把它拍卖给帝国主义。当时各省的铁路公司，多数掌握在立宪派手中，清朝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首先触犯了立宪派的利益，因而铁路风潮便由他们首先闹起来。立宪派本来打算借群众力量和清朝政府讨价还价，攫取一部分铁路股金。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不再受他们的控制，声势越来越大，成了清朝政府灭亡的前奏。这是立宪派料想不到的。

铁路风潮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呢？这里面有比较深远的历史原因。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日益加紧对中国的掠夺。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它们普遍采用的手段，就是掠夺主权与输出资本，来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其中抢夺铁路借款（或直接投资）权利，又成为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项目。因为贷款（或直接投资）修建铁路，不但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把持铁路的经营管理权，还可以控制铁

路沿线的贸易、矿产、森林、电讯等事业，甚至可以取得在铁路附近设卡收税、驻兵以及利用铁路运兵的特权。这样，随着它们所操纵的铁路线的延伸，势力范围也就相应扩大。

正因为抢夺铁路主权，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后起的美帝国主义特别看重它。一八九六年，美国成立了一个“美华合兴公司”，专以掠夺中国铁路为目标。这个公司成立后，第一眼就看上了粤汉铁路，想通过清朝政府把路权夺过去。那时湖南的绅商（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官僚，或与地主官僚有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也想扩展自己的经济势力，联合湖北、广东的绅商，向清朝政府提出自办铁路的要求。清朝政府正在用大量出卖矿山、铁路和领土主权的方式，勾结帝国主义，借以维持日益衰微的反动统治，对三省绅商的要求自然置之不理，并在大买办盛宣怀的策划下，先后于一八九八年四月、一九〇〇年七月，和美华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与“续约”，把粤汉铁路主权出卖给美帝国主义。

正当美帝国主义阴谋夺取粤汉铁路主权的时候，中国的北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因此，美帝国主义虽然用狡诈手段把路权夺取到手，却非常害怕铁路沿线人民起来反对，不敢全面兴工。后来，又在国际市场上大搞投机，把三分之二的借债股票，卖给比利时商人，从中牟取暴利。

美帝国主义这一卑鄙行径，直接违反《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规定，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马上掀起一个废约运

动。废约运动与这一年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结合起来，声势更大。这样，美帝国主义只得被迫暂时放弃独占粤汉铁路的企图，答应废约。但它的魔爪是不会轻易缩回去的。它一面答应废约，一面又强迫清朝政府用极高的价格，把已修好的三十多公里铁路“赎回”。一次就勒索了三、四百万美元。

路权收回后，湖南、湖北、广东三省分别设立铁路公司，筹款兴筑。款项来源一部分是绅商的投资，多数是取之于一般群众，如用加征货物通行税的办法筹集的“米盐厘金股”，和按地租多寡比例入股的“租股”，实际负担都落在广大劳动群众身上。此外，还有用工资提成办法集来的股，和人民群众自愿投入的“零股”等。由于这些原因，路权问题便成了有关各省各阶层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于一条纵贯三省的铁路干线，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是不会甘心的。清朝政府中一小撮反动分子，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出卖国家主权的机。因此，关于粤汉铁路的黑市交易，照旧在紧张地进行。还在向美国“赎路”的时候，奉命“筹办收回粤汉铁路事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借口“赎款”不易筹集，转向英国借款来偿付，答应给英国以粤汉铁路投资的优先权。这就等于从美国手中收回主权，再出卖给英国。一九〇八年，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清朝政府任命张之洞为“督办粤汉铁路大臣”，与帝国主义交涉借款修路，一九一〇年与英、德、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美帝国主义眼看粤汉铁路即将落入英、德、法三国手中，非常恼火。美国总统塔夫脱亲自出面，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并与英、德、法三

国闹了一通磨擦。一九一〇年五月，终于在巴黎达成四国借款协议。于是，经过三省人民力争收回的粤汉铁路主权，又正式被出卖了。

正因为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早有成约，所以皇族内阁一上台，就强硬地用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把铁路主权收归国有。还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铁路公司。清朝政府中的一群卖国贼，一面以兴建铁路为借口，大借外债，贪污中饱；一面又以“铁路国有”为招牌，夺取商民对于铁路的投资。他们一箭双雕，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这种反动做法，不仅引起人民的反抗，连那些原先替他们捧场的立宪派也被激怒了，因而把自己赶到了最狭小的阵地上。

溥仪的“上谕”传到地方，首先起来反对的就是湖南的绅商。他们聚集在谘议局开会，散发传单，揭发清朝政府大借外债、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继而学生们罢课抗议，斗争更加激烈。湖南巡抚杨文鼎见民气激昂，怕事态扩大，奏请仍然照前办理。清朝政府严加申斥，责令他对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行镇压。湖北的斗争更为剧烈，革命党人詹大悲，在《大江报》上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题发表文章，鼓吹革命。湖广总督瑞澂逮捕詹大悲，查封了《大江报》。于是数千人跑到谘议局去开会，会上有人砍断指头，痛哭流涕，大喊救国。他们派出代表到北京去请愿，曾绝食三天三夜。广东铁路公司的股东会议，也一致反对把铁路收归国有。他们不用清朝政府发行的纸币，表示抗议。在清朝政府的高压下，股东们逃到香

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斗争。同盟会在香港的《中国日报》及其他报纸，都极力声援这场斗争，吓得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禁止报纸入境。

这场斗争在四川规模更大，也更深入、持久。

四川省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一九〇四年。此后，英、法帝国主义一直图谋夺取川汉铁路的主权，都被拒绝。一九〇九年清朝政府再次出卖粤汉铁路，也出卖了川汉铁路。因为所谓《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就包括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湖北段在内，清朝政府实际上是把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境内的路权，全部拍卖了。正是根据这个“合同”，清朝政府宣布，四省的铁路公司全在端方的接收之列。溥仪的“上谕”传到四川后，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立宪派头子蒲殿俊、罗纶被推为正副会长。

四川的保路同志会，虽然是立宪派一手搞起来的，但它是一个公开的组织，有利于广大群众参加保路斗争。四川的铁路公司，当时还把持在立宪派等上层分子手里，但由于它的款项来源，大部分是取之于下层劳动群众，所以广大劳动群众对于这场斗争也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当时有一首歌谣说：“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那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正因为广大群众看到了路权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所以纷纷参加保路同志会。

保路同志会成立不到半个月，会员已达十万人。斗争非

常激烈，立宪派大为震恐，竭力把运动限制在上书、请愿的范围内。但是，清朝政府并没有被他们的磕头、上书所感动，反而派杀人魔王赵尔丰做四川总督，来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赵尔丰本来是四川省永宁道的道台，一九〇四年春，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杀死叙永县抗捐的农民三千多人，因而被清朝统治者提升为川滇（音颠 diān）边务大臣，四川人民恨透了他。此时要他当四川总督，前来镇压保路运动，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

八月，清朝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宜昌至万县），消息传到成都，正在开会的铁路公司股东马上哄闹起来。他们和保路同志会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几万人，当即举行罢课、罢市表示抗议。成都罢课、罢市后，其他各州县都罢课、罢市响应，报上天天登载着贫民暴动，捣毁经征局、巡警分局、外国教堂，以及和警察发生武装冲突等消息，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九月一日，群众宣布不纳粮，不纳捐税，不担任外债分厘，掀起了抗捐、抗税的斗争，使保路运动向前跨进了一步。

四川是清朝政府榨取财赋的重要省分，群众起来抗捐、抗税，清朝统治者手忙脚乱，急忙派端方从湖北带兵入川镇压。同时指令赵尔丰采取高压政策，妄想把群众斗争的火焰扑灭。

九月七日，赵尔丰逮捕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人，群众纷纷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人。赵尔丰竟公然命令士兵开枪，当场杀死群众三十二人。从郊区赶来支援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造成了著名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一些同盟会会员，就用木板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等字样，涂上桐油，用油纸包裹，乘夜投入锦江中。他们称之为“水电报”。“水电报”顺流而下，赵尔丰的罪行很快传遍川东南各地，爆发了全省规模的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占州县。吴永珊（吴玉章）、王天杰等人，于九月二十五日宣布荣县独立，建立革命政权。四川的革命，直接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朝政府把湖北的军队调往四川，削弱了湖北省的反动统治力量，也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武昌起义

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的铁路风潮高涨后，湖北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经过他们紧张策划，武汉三镇终于成了辛亥革命的重要突破口。

前面讲过，同盟会成立前后，广东、两湖和长江下游的几个省份，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在革命党人的活动下，很快就形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几个中心点。在这几个中心点中，湖北地区的武汉三镇，又具有重要地位。

武汉三镇所以重要，有它客观的条件，也有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

就客观条件来说，这里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革命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深入内地，武汉三镇是他们进行掠夺的一个中心。据统计，一八九八年汉口的对外贸易额是五千万两，一九〇二年增加到一亿两，一九一〇年再增加到一亿五千万两，十二年间增加了两倍，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帝国主义潮水般的商品倾销，和

疯狂的原料掠夺，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封建统治者也日益加速买办化。一八八九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后，就以湖北为中心，开展洋务活动，创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张之洞曾经供认，他所创办的企业，不仅全部机械设备、技术人员来自外国，甚至“厂屋之铁梁、铁柱、厂基、炉座、路工、水泥、火泥等”，也“无不来自外洋”。正因为它一切仰赖外国，一部分资金也是从外国借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被外国所控制，成为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张之洞之流引狼入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也进一步把内地人民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中外反动派的紧密勾结，首先使广大农民遭殃。一九〇九年接替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音奎 kui）龙，在给清朝皇帝的一份奏章中说过：“近以朝廷力图自强，出款繁多，几骤过从前数倍。”所谓“自强”，就是指“洋务新政”。这数倍的额外负担，都化作名目繁多的赋税，落在城乡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身上。

此外，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湖北地区的许多大地主都直接经营商业和钱庄业，成为帝国主义商业高利贷剥削网的一部分。他们一面向农民勒索五成以上的地租，一面又通过买贱卖贵、放青苗债等手段，为帝国主义掠夺原料，残酷地榨取贫下中农的血汗，使他们经常处于无法生活的困境中，因而也大大地破坏了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二十世纪初年，湖北地区水利失修，灾荒连年，“所有受灾之区，一片汪洋，数里之内不

见烟火”。大批灾民拥入城市，汉口一时聚积灾民二十多万人，既扩大了城市的失业队伍，也使统治者无法维持反动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前夜，在长江流域人民反饥饿、抢米风潮的激荡下，加上邻近省分铁路风潮的推动，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革命情绪更加炽烈了。湖北统治者的脚下，随时都可以喷发出革命的火焰。辛亥革命所以在武昌爆发，决不是偶然的。

除了客观条件外，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特别是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十多年的踏实工作，是武昌起义的重要原因。

一九〇二年冬，湖北籍留日学生、革命党人吴禄贞回到武汉，被张之洞委派担任湖北清军营务处帮办。他利用张之洞对他的信任，以合法身分作为掩护，在清军和知识青年中努力传播革命思想。后来他虽然奉调去北京，却为日后的湖北革命运动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一九〇三年以后，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湖北的一批知识青年，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认识到“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相约投入新军当兵。他们在同营士兵中散发革命书刊，宣传革命思想，集结革命力量。一九〇四年六月，武昌正式成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表面上研究科学，实际上预谋革命。十一月，科学补习所因准备响应黄兴的长沙起义，受到清朝政府的镇压，主要领导人纷纷逃离武汉，团体也自行消散。

一九〇五年，原科学补习所的一部分人员，利用武昌的一个阅览室，陈列革命书刊，吸引革命分子。这个阅览室名叫“日

知会”，所以一九〇六年三月他们正式组成的革命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日知会组织发展很快，据说有会员近万人。他们每星期都要举行演讲会，讲述世界大势、中国的危机，以及挽救危亡的道理，在各界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同盟会成立前后，日知会是当时较有力量的一个革命团体。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很快发现了日知会的力量，马上派人回国，和它建立组织上的联系，通过它对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领导。

一九〇六年冬萍、浏、醴大起义，日知会准备响应，由于叛徒告密，领导骨干几乎被清朝政府一网打尽，从此有一年多时间无法开展大规模的革命活动。正在这个当口，同盟会派生出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势力很快伸展到湖北，从此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出现了一个领导中心。

当共进会在湖北建立组织之前，原日知会中的一些革命党人也在积极地筹划重建组织，一九〇八年夏成立“军队同盟会”，后来几经挫折，又以“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名称，在新军中进行活动。一九一〇年，湖北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探知振武学社是个革命团体，对它的领导人进行迫害，革命党人又于一九一一年初以“文学社”的名称重建组织，推蒋翊（音意 yì）武为社长，继续活动。不到半年，就在新军中发展社员三千多人。

文学社成立后，同盟会内部起了一点分化。一九一一年七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一些原籍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会员，不满意同盟会总部多年来集中精力经营华南的做法，在上

海邀集一些与他们具有相同认识的同盟会会员，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并在湖北设立分会，直接插手湖北地区革命活动的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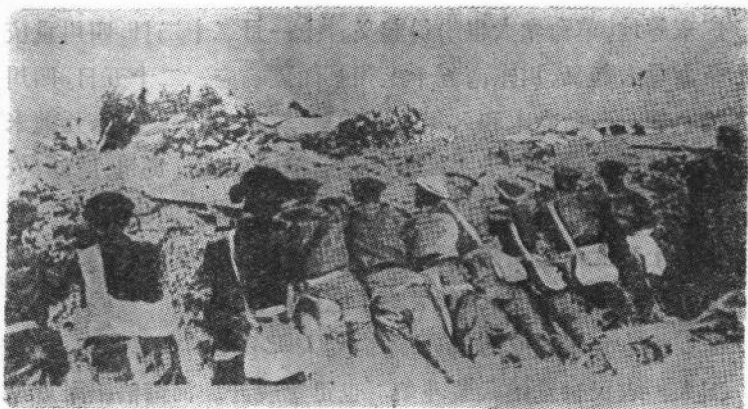
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门户之见很深，革命活动一直不能很好配合。由于武装起义的需要，经过同盟会中部总部某些成员的一再撮合，一九一一年春开始谈判联合问题，九月下旬达成协议，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推共进会的首领刘公，任未来的军政府总理，文学社首领蒋翊武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共进会另一首领孙武担任参谋长，其他重要职务也由双方领导骨干分别担任。经过长期磋商和争执，联合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矛盾并未化除。据说决定刘公任总理而不称都督，就是为了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能过问军事。

十月八日，孙武在汉口“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沙俄巡警闻声赶来，将制备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全部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被宪兵、巡警包围，革命党人刘尧澂、彭楚藩等被捕，蒋翊武借机逃走。其他领导骨干有的被迫逃走，有的隐蔽下来。同时，革命党人杨洪胜也因运送弹药被捕，此外被捕的还有二十多人。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将被捕的革命党人惨杀，又严密封锁新军的各标(团)各营，在武昌全城实行特别戒严，所有革命党的秘密机关都遭到搜查。瑞澂以为革命的领导机关已被破坏，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已被禁锢在营房中，革命火焰已被扑灭了，于是得意忘形地给清朝政府发了电报请功，说他已经“弭患于未萌，定乱于俄

顷”了。清朝政府随即回电嘉奖，回电尚未发出，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已经正式爆发。

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起事，打死前来镇压他们的排长、队官（连长）和代理管带（营长），冲出营房，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夺取枪枝、弹药，守卫军械库的革命党人打开库门响应。于是，步兵、炮队、辎（音资 zi）重各营和军事学校的学生，都闻风举义，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一个曾经参加过日知会的队官担任指挥，往攻总督衙门。据估计，当时驻守武汉的清军约有二十二个营，参加起义的有五个营，还有十七个营在清军将领的控制下，从编制上看，它还大于革命力量三倍。但是由于革命党人的深入工作，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已经有革命党人约五千名，占全数的三分之一。所以起义一爆发，清军指挥系统顿时瘫痪，只有少数几个营尚能负隅顽抗。经过激战，顽抗的清军溃败，瑞澂等反动官员慌忙携带家中老小，挖开督署后墙，逃跑到停泊在长江中的“楚豫”号兵船上。当晚，武昌就被起义军占领。十一日晚和十二日清晨，驻汉口、汉阳的新军起义，武汉三镇全部光复。过了几天，革命党人又起义于永隆河、汉川等地，克服天门、监利、潜江等县，缴获清军水师船只三十多艘。武汉外围趋于稳定，革命形势飞速发展。

起义的成功，使得革命精神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迅速高涨，人民群众一旦摆脱了长期以来黑暗的封建统治，那种欣喜若狂的情景和投身革命的热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十月十二日，革命军扩军四协（旅），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踊跃



革命军在汉口对清军作战

应募，五天内就满额了。十月十六日，革命军发动对退据汉口近郊刘家庙清军的进攻，新来的战士虽然没有作战经验，但人人充满旺盛的革命热情，一鼓作气，很快就摧陷了清军的阵地。十八日迎头痛击南下镇压起义的清军，附近的铁路工人和农民，也纷纷拿起工具和锄头，逐杀四散逃溃的敌人，取得了全歼敌人的胜利。

武昌起义的胜利，打开了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大缺口，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许多地区的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也纷纷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十月二十二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和会党起义队伍攻入长沙，击杀清朝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赶走巡抚余诚格。湖南起义的胜利，使武昌免去了后顾之忧。接着，陕西、江西、山西、上海、浙江、

广东等地，革命党人也纷纷起义。十一月二十二日，四川重庆革命党人起义，川东南五十七州县闻风响应。二十五日，四川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和入川的湖北新军在资州起义，杀死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刽子手端方。在这前后，云南、贵州、广西、安徽、福建等省，有的举行起义，有的宣布脱离清朝政府独立。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起，到十一月下旬，清朝政府所辖的二十四个省区，已经有十四个省脱离了它的统治。

没有宣告独立的省分，革命党人所策动的新军起义，以及工人、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也迅速展开。河南信阳附近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军，出没在铁路两侧。十一月间，他们先后用扳岔道、拆铁轨等方式，使运载清兵的列车翻车，又袭击粮库、弹药库和运送弹药的列车，大大支援了武昌的革命战争。此外，山东、辽宁等地，农民起义的声势也很大。甚至在清朝统治的根本重地直隶（河北），革命党人也在活动驻扎滦（音栾 lúan）州、保定一带的新军起义，进攻北京。风声所及，清朝统治者心惊胆裂。

革命形势飞跃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继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之后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革命高潮，反动的清朝政府，也就在这个高潮中被冲垮。这次革命高潮，以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为标志。一九一一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领导的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又被称为辛亥革命。

十一、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的崛起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朝政府大为震恐，一面责令瑞澂戴罪立功，拚死夺回武昌，一面又派陆军大臣蔭昌（音印 yin）昌，率领北洋军两军南下镇压起义。南下清军，第一军由蔭昌亲自指挥，第二军由冯国璋指挥。清朝政府又调遣河南豫军、长江水师，前往湖北协同作战。

武昌起义后，汉口、汉阳相继光复，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清朝政府中一小撮王公贵族感到危机深重，认为必须调整反革命内部关系，才能挽救自己免于灭亡。十月十四日，清朝摄政王载沣亲自下令，起用三年前被他赶回老家“养病”的袁世凯，要他担任湖广总督，前往湖北，代替被革命军赶跑的瑞澂。袁世凯虽然去职三年，但是北洋六镇（师）新军仍然在他的爪牙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等人控制下。因为他有实力，清朝政府不得不向他低头。

清朝政府越是借重袁世凯，袁世凯的要价就越高。他嫌湖广总督官衔太小，不能满足他霸占全国的反革命野心，接到命令后照旧赖在彰德不动，借口“足疾未痊”，不愿出山，暗地里却指使冯国璋的军队“慢慢走，等等看”，利用南方蓬勃发展的

革命形势，作为向清朝政府讨价还价的条件。与此同时，又指使他的党羽，向清朝政府提出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和改组皇族内阁的要求。

袁世凯想一举拿下清朝政府的军政实权，清朝皇族中的亲贵大臣当然不愿意，闹成了僵局。

十月下旬，湖南、陕西、江西等省，一个接着一个宣布独立，派往湖北的陆军大臣蔭昌，又指挥不动北洋新军的将领，在前线连吃败仗。清朝政府不得已，召回蔭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清朝皇族向袁世凯让了第一步。

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省爆发革命，直接威胁清朝的首都北京，同时驻滦州的新军也发表通电，要求召开国会，改组内阁，并且扣压了沙俄由西伯利亚铁道运往湖北镇压革命的一列车军火，又扬言要向通州、南苑方向移动军队，对清朝政府进行武力威胁。清朝政府中的当权人物，眼看祸从脚下起，心慌意乱，认为与其死在起义军的炮火中，倒不如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还可以求得他的庇护。十月三十日，皇族内阁宣布解散，第二天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筹组新内阁。清朝皇族向袁世凯投降了。

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前几天，他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怕赖在彰德太久，革命浪潮会冲垮清朝政府，使自己失去反革命的凭藉，所以连忙南下督促冯国璋猛攻汉口。这时，武汉方面起用了一个反动军官张景良，做起义军的总指挥。张景良原是湖北清军第二十九标标统(团长)。

这个反动家伙表面上假装拥护革命，暗地里却勾结袁世凯的反革命军队，所以战斗一再失利。后来黄兴来到武汉，亲临前线，督师反攻，终于因为袁世凯反革命势力强大，又受到革命内部暗藏反动势力的牵制，败退汉阳。冯国璋占领汉口后，纵容军队大肆掳掠奸淫，放火烧了三昼夜，三十里街市化成一片瓦砾。冯国璋的反革命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汉口失陷后，反革命的气焰抬头了，袁世凯又捞到一笔政治资本，才于十一月十四日北上筹组新内阁。在这之前，他又收买凶手，刺杀了在北方活动多年的革命党人吴禄贞。吴禄贞于一九〇三年奉调入京后，先后担任过清军练兵处监督、延吉边务帮办等职务，武昌起义前又被委派为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师长）。他与驻滦州的新军密约举兵反清，又与山西革命党人有联系，因此被袁世凯看作眼中钉。吴禄贞被刺后，袁世凯又乘势解除滦州新军中倾向革命的主要将领的兵权，并制止了山东的独立，在整个北方稳定了反革命统治秩序。十一月十九日，袁世凯内阁成立。内阁成员除了袁世凯的死党赵秉钧、王士珍，和他的老同事唐绍仪外，还有立宪派头子张謇、梁启超等人。接着，袁世凯又任命爪牙冯国璋总统禁卫军，并调自己直辖的拱卫军，进驻北京。这样，一个以北洋军阀为核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集团，利用人民革命的声势，取代了清朝皇族集权的当权势力，成了全国反革命的中心，袁世凯本人也就成了反革命阵营的总头目。

袁世凯所以能够代替清朝政府，成为当时反革命的政治首脑，重要的原因在于得到帝国主义支持。

毛主席说：“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①辛亥革命就是如此。

辛亥革命时期，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于帝国主义抱有那么多的幻想，而帝国主义却没有一天放弃过绞杀中国革命的企图。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炮声一响，帝国主义就毫不犹豫地站在清朝政府一边。十月十一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交部打电报说：“武昌全部革命，焚毁官署，湖广总督现住中国巡洋舰，停泊在英国炮船之后”，“本大臣现请英国水师竭力相助”。十二日，德国也派炮舰“老虎”号、“祖国”号、“水獭”号到达武汉。据他们自己供认，十七日卷入了“热烈的战争中”。十三日，美国政府训令它驻中、法、德、意、英、日、俄七国公使，要求他们迅速纠合国际反动势力，干涉中国革命。此后不久，美国侵略者又和清朝政府签订合同，帮助它扩展军备。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给攻打汉阳的清朝军队提供种种方便，帮助他们架设军桥、运送军队、提供情报、供给粮饷等。

事实证明，辛亥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但是帮助清朝政府、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那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重重，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锐。它们不仅忙于争夺非洲的斗争，美、日、英、俄之间在远东也是互相角逐、互相牵制，因此在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不能完全步调一致，无法采取联合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行动。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〇页。

帝国主义并不就此罢休。武昌起义后客观形势很快表明，清朝政府非垮台不可。为了迅速绞杀中国革命，在支持清朝政府反革命的同时，帝国主义又在进行另一项更加毒辣的反革命阴谋。这就是扶植另一个在他们看来更“忠实”、更“强有力”的走狗，作为继续统治中国人民的新工具。当时最有反革命实力的北洋军阀大头目袁世凯，很快就被他们看中。

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老搭档，早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就因为屠杀中国人民特别卖力，受到了洋主子的赏识。所以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帝国主义就在大造“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反革命舆论。武昌起义后两天，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北京扬言：“如果清朝政府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这些话，泄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叛乱”，需要加以“平息”，只有袁世凯这样的反革命实力派，才能充当“平息”革命的走狗角色。帝国主义一致属意于袁世凯，对于一贯仰承帝国主义鼻息的清朝政府来说，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过了两天，清朝政府就决定任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但是，袁世凯不以湖广总督的职衔为满足，暗派亲信去美国使馆提出更高要价。美国驻华使节于是积极进行活动，要求各国驻华公使为袁世凯攫取更多权力制造舆论。他们一致指摘清朝政府，不应该把袁世凯当作一般高级官员看待，应该给以更多的权力。美国侵略者的喉舌《大陆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五日还以《时代宠儿袁世凯》为题发表社论，赤裸裸地表达了帝国主义的愿望。社论说：“帝国（清朝）情势现正面临

危机，注意中国事态发展的人，不能不注意到人们口头上自然而然地提到袁世凯的名字。”然而“清政府虽将统率全军的职务交给袁世凯，但不幸的是，这并不足以保证袁世凯回京任职”，因为“任何低于内阁的位置，是与他的才干和成就不相称的”。并警告说：“除非清政府再次召回袁世凯，参与国事，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政府取得国内外的信任。”清朝皇族中的王公大臣终于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很大程度是由于这种压力造成的。

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后，帝国主义高兴极了。英帝国主义马上表示支持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此后，各国驻华使节立即开会，向袁世凯致贺，又达成协议，授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由他出面与袁世凯会谈所谓“妥善行动”，也就是密谋绞杀中国革命的具体措施与办法。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所有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重新结合在一起。以袁世凯为头目、以北洋军阀为核心的反革命政权，是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是帝国主义更加凶恶的走狗。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取得了对于清朝政府的胜利，但是由于他们的革命不彻底性，在袁世凯反革命势力面前，很快就妥协投降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也因此很快被中国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所篡夺。

十二、各地反动势力的篡权活动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鲁迅先生的诗句，深刻地揭示了武昌起义后的社会本质。清朝政府一天天倒下去，大大小小的“桃偶”，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随即粉墨登场，照旧骑在人民头上。在反革命势力统治的北方，袁世凯的反革命政权代替了清朝政府；在革命势力统治的南方，各级地方政权中又钻进了许多小“袁世凯”，进行紧张的篡权活动。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内部却潜伏着极为深重的危机。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①中的“未庄”，就是当时南方社会在文学上的反映。

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四日)深夜，一只大乌篷船驶进了未庄，举人老爷要下乡逃难了，说明革命一开始尚有相当程度的威慑力量。因此，它给未庄的地主劣绅如赵太爷之流带来了不安，也使阿Q等下层群众快意和“神往”。但是不久，“听说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当时的革命党人把它叫做“咸与维新”。

^① 《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为背景，通过雇农阿Q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描写，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咸与维新”的气候，使未庄上唯一象征革命与反革命对立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①之间，消除了隔阂，“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他们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把龙牌打碎在地，并顺手拿去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等到阿Q去“革命”，已经是很晚了。阿Q碰了几次钉子，悟出要革命必须“结识”革命党的道理，于是怀着友好的感情，去投合“假洋鬼子”，没想到“假洋鬼子”竟扬起手杖，喝令他“滚出去”，不准他革命！过了好多天，又是一个深夜，突然“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架起机关枪，包围了阿Q住的土谷祠，胡胡涂涂地把他捉去了，又胡胡涂涂地把他绑赴刑场枪毙了。阿Q临死前，知道自己唯一的罪状，就是“我想造反”！

鲁迅先生对于辛亥革命的描写，真是深刻入微。透过小说中的未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方社会的大致情景。

武昌起义前，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形势的估计很悲观。他们只看到自己和少数革命党人的活动，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愿望，虽然想加以利用，但往往因蔑视而投以冷漠的眼光。因此，当他们的起义计划屡遭挫败后，便有的离去、有的颓废、有的忧郁而死。坚持战斗的也有，但孤军奋战，形成不了坚强的领导中心，更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

武昌起义后，由下层士兵点燃的革命烈火，很快就因工农

^① “假洋鬼子”是地主钱太爷的儿子，日本留学生，剪去了辫子，回国后又装了一条假辫子，所以阿Q叫他“假洋鬼子”。赵秀才也是地主、劣绅赵太爷的儿子，封建余孽。

群众运动的声威而烧遍全国。发动这场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有功绩的。革命起来了，他们的软弱性也同时暴露出来。清朝政府一天天倒下去，革命党的很多人就一天天失去了前进的目标，面对着强大的反革命势力——袁世凯和他背后的帝国主义，甚至失去了革命的勇气。他们一再声明，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又拿出“秩序革命”这根大棒，企图用镇压群众、保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恶劣手段，换取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同情。他们越来越多地把革命解释成只在于推翻清朝政府，声称不论什么人，只要反对清朝，拥护共和，就可以引为同志，以为这样就可以争取袁世凯和清朝的各级地方官吏。恰恰相反，一切反革命势力正利用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投机革命，先从内部窃夺革命果实，再把它送给袁世凯。所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各级地方政权也沿着不同形式，纷纷落入反动势力的手中。

第一种形式，以“首义之区”的湖北为代表。这些地方本来是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的，因为没有坚强的领导，军政实权很快就被旧官僚、立宪派等反动势力所把持，刀把子一开始就捏在别人手中。

十月十一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积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所以提了一些人的名字，都没有被通过。这时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首领，又在起义前夕或遭杀害，或被迫逃

亡，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可供推举。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看准了苗头，就乘机举荐黎元洪，要他出来当都督。

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投奔张之洞，任湖北清军马队营官，一直升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是张之洞等湖北统治者最得力的帮凶。十月十日晚间，他坐镇军营，亲手杀死一名响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又被他枪杀。直到听说瑞澂已经逃走，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他才慌慌张张躲到一个参谋家里去。因为他平时装得厚道、宽大，伪善的面孔欺骗了不少人，加上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等文件中，散布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黎元洪“声望高”，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定有很大的“号召力”。所以一经提出，大多数革命党人都表示赞同。这时，黎元洪还不相信果真能够推翻清朝统治，不肯接受要求。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表示对清朝的忠心。革命党人只得另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大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立宪派的头目、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于是又被推荐出来，担任民政部长。汤化龙口头上表示“效死用命”，暗地里却给清朝政府拍电报说：“化龙决不从逆”。新诞生的湖北军政府，军政要职一开始就被两个反动家伙窃据。

后来革命形势一天天发展，钻进革命政权的反动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于是加紧活动，窃夺权力，从内部瓦解革命。狡猾的汤化龙首先施展鬼蜮（音育 yù）伎俩，拉拢

到达武汉的同盟会总部的不坚定分子，于十月十六日提出一个《都督府组织暂行条例》，冒称是同盟会总部草拟的，在都督府会议上通过。根据这个条例，谋略处被取消，革命党人的兵权被剥夺了。都督黎元洪兼任革命军总司令，再改民政部为政事部，总揽政务，仍由汤化龙任部长。这时，黎元洪也活跃起来，积极把持政权，发号施令。又利用革命派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团结，挑拨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甚至互相陷害，达到瓦解革命力量的目的。就这样，湖北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还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其余可想而知了。武昌起义后的陕西、浙江、福建等省，都发生过类似情形。

第二种形式，以湖南为代表。湖南本是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经过激烈战斗，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但是由于革命党人警惕性不高，对反动势力斗争不彻底，没有全部瓦解湖南的反动军队，却把它整队收编。结果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反动分子，收买新军中的反动官员，煽动士兵叛乱，杀害焦达峰和陈作新，立宪派头子谭延闿（音凯 kǎi）乘机当上了都督。

贵州省也出现类似的篡权事件。十一月四日，贵阳革命胜利后，革命派内部发生争论，一派认为对反动派必须镇压，另一派认为宜“取宽大主义，免增怨毒”。结果“宽大主义”占了上风，决定在新成立的革命政权中，革命派和立宪派各占一半名额。革命党人一抬脚，就走错了第一步。

早在贵阳起义前，贵州巡抚曾电调一支反动武装前来镇压。这支军队还在行进途中，贵阳起义已经胜利，因而进退失据。革命派内部又发生争论，有人主张消灭它，免除后祸；有人则认为可以利用，若不服调遣，再解决它不迟。就是根据后一种意见，革命党人不仅把这支反动武装按原编制收编入城，还发给大量武器、弹药。后来，立宪派就利用这支军队，发动叛乱，捕杀大批革命党人，再进一步勾引云南军阀唐继尧，把革命党的主要骨干，几乎斩尽杀绝。资产阶级革命派怜惜毒蛇一样的恶人，反遭毒手，这是历史遗留给人们的教训！

第三种形式，以江苏为代表。十一月三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胜利，推动了江苏各地群众运动和新军起义蓬勃开展。苏州立宪派和绅商各界的上层分子，在革命声威的逼迫下，举行请愿，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抢先一步宣布独立，以逃避革命力量的打击。程德全接受请求，于十一月五日，把巡抚衙门改称“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巡抚改称都督，举行一个仪式，发表一通口是心非的演说，然后由上海派来的革命党人登台授印，江苏的革命就算完成。当时有一则报道说：“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屋堂上的几层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这是对于江苏独立的深刻讽刺，也是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严厉鞭挞。

过了两天，广西巡抚沈秉堃（音昆 kūn）也如法炮制，宣布广西省独立。广西独立前，沈秉堃收到各省独立的电报，晓得大势已去，十一月六日召开部属会议，决定做做表面文章，于是连夜要人缮写大字标语数百份，上面写着“大汉广西全省国

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贴遍桂林全城。十一月七日一早，立宪派就在谘议局开会，推举沈秉堃为广西省都督。比起江苏来，程式之简单，可谓后来居上！但是沈秉堃的都督没有当上几天，原广西省清军提督陆荣廷又发动兵变，把广西省的军政大权全部抢到自己手中。

除了上述情形外，有些省份比较曲折，几经反复，政权表面上落到了革命党人手中。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后，很快就向右转，或者化为反动的政客，或者变成地方军阀，他们的统治，也不比旧政权好多少。广东、四川、安徽等省的情形，都大致如此。

从各省独立后的情形看，不论是钻进来的旧官僚掌权，还是革命党人掌权，压制工农群众运动，解除群众武装，都是共同的。广东独立后，革命党人自己承认，光是省城内被裁撤的民军就有九万人，清军统制龙济光所统率的反革命军队，却一直被保留。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全被遣散，有的还被当作“会匪”惨遭屠杀。在旧官僚掌权的地方，反动武装有的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国民军”，有的起初被打散，反动派上台后，又利用权力重新建立起来；而工农群众运动和下层革命党人的活动，则一直被禁止。新产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一开始就处在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激烈得快，后退得更快，他们根本不能领导人民取得真正的胜利。后来，孙中山在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所以步步退让，正是由于这种客观情势所造成。

十三、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

革命内部的危机，不仅表现在独立的各省政权很快落入反动官僚和立宪派手里，重要的还表现在同盟会的迅速解体。

从武昌起义到十一月中下旬，各省纷纷独立，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怎样建立全国政权？由谁来掌握政权？面对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又一次充分暴露。为了集团和个人攫取权力，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惜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于是在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之间，产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分化与结合的过程。上海和武昌陆续出现许多以争夺权势为目标的小党派、小团体，曾经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面旗帜的同盟会，至此正式瓦解了。这些小党派和小团体，逐步形成两个中心，这就是武昌方面的“民社”，和上海方面的“共和统一会”。武昌起义后，章炳麟曾经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章炳麟本人就是带头搞分裂的一个，他的话也集中表达了当时的实况。

民社以湖北的一批野心家为中心，目的在于保持湖北政客集团的政治地位。它的首领是黎元洪，主要成员有黎元洪的一批亲信爪牙，加上同盟会的湖北籍会员蓝天蔚、孙武，以

及湖南立宪派头目谭延闿等人。他们出报纸、发宣言，标榜“进步主义”，但真正目的还是反孙倒黄，利用武昌首义的政治地位，建都武昌，由他们来控制中央政权。

共和统一会是当时麇集在上海的大批政客的政治集团。发起人是上海都督陈其美、同盟会会员伍廷芳、立宪派头目张謇。还有刚被清朝政府释放、已被袁世凯收买的内奸汪精卫。他们勾结江浙立宪派头目与反动官僚程德全、汤寿潜之流，想凭他们的实力地位，以他们为主体来建立和控制中央政权。

在这一班新老政客的奔走下，武昌和上海同时出现了组织中央政府的活动，形成两个集团互争领导的局面。

十一月九日，武昌方面由黎元洪出面，请宣布独立的各省来电，提出各部部长人选，票数多的人到武昌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按照武昌集团的意见，武昌政府就是中央政府，只要各省通过部长名单，得到外国承认，就可以成为全国的合法政府。两天以后，上海方面也电请各省派出代表，到上海开临时会议。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上海方面抢先成立了组织。

十一月十七日到二十日，上海的代表会讨论黎元洪给各省的通电，认为上海交通便利，开会地点应在上海，请湖北速派代表到上海开会。代表会同时又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中央政府，由湖北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湖北以中央政府名义，委派各省代表所推举的伍廷芳、温宗尧，为中央政府的外交代表。黎元洪接到通知后非常不满，派代表到上海力争，上海方面只得改变决定，各省代表留一人在上海保持对外联络，组织

临时政府问题，改在武昌讨论。

十一月底，当各省代表陆续由上海到达武昌时，黄兴所统帅的湘鄂联军正在大吃败仗，汉阳失守，武昌陷入清军炮火的威胁下，代表会议只得借汉口英“租界”召开。会议进行了三天，上海方面在十一月下旬所组成的苏浙联军，这时攻下南京，于是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于一星期内在南京会齐，继续开会。十省以上代表出席，就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汉阳失守，南京光复，武昌和上海政客集团的地位起了变化，一个削弱了，一个加强了。陈其美一流资产阶级政客抓住机会，于十二月四日会同程德全、汤寿潜等人，邀集原来留在上海做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开会，认为汉阳失守，武昌危急，汉口的代表会已经无法组织临时政府，因而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以大元帅主持组织政府。武汉方面得到消息非常恼火，马上由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表示反对。

正当上海、武昌两地的政客，为组织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牵引下到达汉口，使这场斗争更加趋于复杂化。

“和平”攻势与军事压力，是袁世凯交互使用的反革命两手。早在袁世凯亲自南下督促清军猛攻汉口时，就命令他的亲信刘承恩（黎元洪的同乡）写信给黎元洪，表示愿意“和平”，只要黎元洪等人肯放下武器，不但不咎既往，还要加以重用。汉口失守后，袁世凯再次进行“和平”试探，武昌方面答复说，只

要袁世凯不反对汉人革命，就可以推举他当大总统。不久，袁世凯派代表来到武昌，与黎元洪等人会谈。黄兴等革命党人坚决拒和，袁世凯的反革命目的无法达到，于是下令猛攻汉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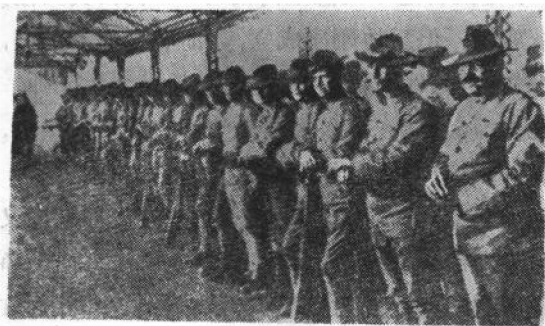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占领汉阳，在龟山上用大炮瞄准武昌轰击。黄兴败退下来，一味宣传敌人的枪炮厉害，主张放弃武昌，转攻南京，被武昌政客集团所斥责，下午便回到上海去。十二月一日，武昌都督府中炮起火，黎元洪吓得六神无主，带了两队卫兵私自逃往葛店，武昌陷于一片混乱中。可是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却只管开炮，并不命令他的部队渡江，他正要利用兵临城下的形势，胁迫武昌方面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袁世凯的“和谈”代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到达汉口的。

十二月十日，在上海和原在汉口开会的各省代表，陆续到达南京，准备选举大总统。会前得到袁世凯“和谈”代表到达汉口的消息，选举大总统议案便又因此动摇。武昌政客集团本来反对上海方面的决议，这时觉得大总统的位置应当留给袁世凯，于是又转过来同意上海的方案，仍由黄兴任大元帅，暂行总统职权。但妥协刚刚成立，苏浙联军却不买帐，声称不愿受败军之将黄兴的指挥，希望由黎元洪当大元帅。代表们再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不肯接受，拖到十二月下旬，临时政府还是组织不起来。

与元帅之争同时，谈判地点成为争夺领导权的又一个中心。当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到达汉口后，上海方面为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坚决反对以汉口为谈判地点。并通知袁世凯说，与武昌方面成立任何协议，他们都不承认。袁世凯本来只

想以黎元洪为谈判对象，因为他既不是革命党，面前又有龟山大炮的威胁，更富于妥协性。但因上海方面力争，同时又感到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比汉口更强大，在那里谈判可能对自己更有利，因而答应以上海为谈判地点。十二月十七日，唐绍仪到达上海。

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举行第一次会议，成立了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接着，英国驻上海领事，带同美、日、俄、德、法领事，往见和谈代表，照会双方“迅速达成和解，以终止现在之冲突”。他们貌似公允，实际上是向南方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立即停止革命行动，迅速向袁世凯投降。二十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同时暗中告诉唐绍仪，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南方愿意以大总统位置作为报答。唐绍仪的使命，本来就是经过谈判，使南方承认袁世凯的地位，这时目的已经达到，就提出一个摸棱两可的意见，说君



美国侵略军在上海登陆，对革命进行威胁

主、民主问题，留待今后召开国会讨论决定。

伍廷芳与唐绍仪的妥协刚刚成立，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从海外回国，给一部分激进的革命党人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他们竭力奔走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同时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仍请孙中山让位。十二月二十九日进行选举，到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三日，各省代表加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九人，组成民国临时政府。月底参议院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包括立宪派、旧官僚在内，但终究是革命分子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它开始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短期内也颁布过一些符合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因此，它的成立，就在人民的心目中宣判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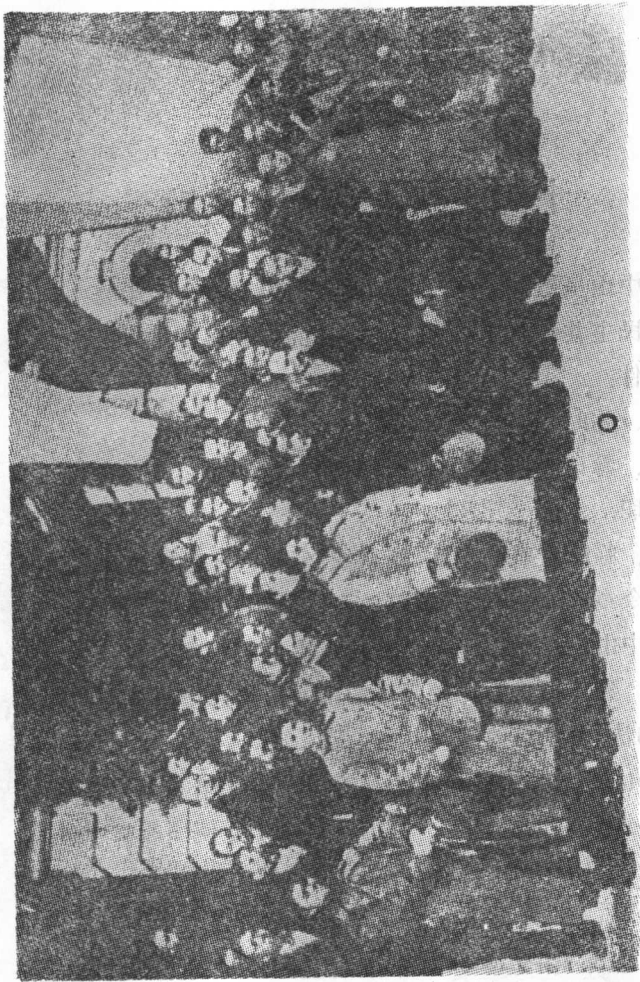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便用它作为向袁世凯斗争的工具。一方面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只要他赞成共和，愿意让位；另一方面又由伍廷芳向袁世凯提出条件，要等共和基础奠定后，才肯接受袁世凯到南京来当大总统。

袁世凯反革命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马上反扑。就在孙中山就职那一天，袁世凯命令他的亲信密电唐绍仪，辞去代表职务，同时由北洋军阀第一军统制段祺瑞，领头发表通电话说：“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必誓死抵抗。”第二天，袁世凯电告伍廷芳，说唐绍仪“越权”，与南方所议各条一概无效，气势汹汹地进行军事讹诈。帝国主义也出来为袁世凯帮腔，声称只有袁世凯统一南北，它们才肯承认民国，借此胁迫孙中山退

位。它们还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配合袁世凯反革命集团的反扑，钻进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以及以他们为中心的党派、团体，也象蛆虫一样在革命队伍内部捣乱。他们公开要求解散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指摘孙中山“理想太高”，“贪恋禄位”。有的人如汪精卫之流，甚至说孙中山所以不肯与袁世凯妥协，就是因为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他们日夜盼望仗不要再打了，好让袁世凯来统一南北，以便自己乘机在袁氏朝廷中捞上一官半职。正因为有这批政客牵线，谈判表面上虽已停顿，幕后秘密活动反而加紧了。秘密交涉的中心只有一个：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作为取得大总统位置的交换条件。

在内外反革命势力逼迫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妥协了。一月二十二日，他指示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只要南方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他就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当大总统。袁世凯接到这个通知，很满意，立即布置逼宫。二十六日，原来通电反对“共和”的军阀，仍然由段祺瑞领头，四十多人联名致电清朝政府，要求确立“共和政体”。清朝的一小撮亲贵大臣束手无策，只得接受革命党人提出的优待条件，于二月十二日由宣统皇帝溥仪“下诏”宣布“逊位”。十三日袁世凯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索取大总统的职位，十四日孙中山退位。十五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当大总统，到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十七票当选，比孙中山当选时还多一票。



一九一二年南京会议，站在中间（有记号○）的是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 革命... 同盟会... 南京... 1912年... 会议... 孙中山... 先生... 革命... 同盟会... 南京... 1912年... 会议...

十四、辛亥革命的失败

孙中山虽然被迫让位，他还希望保卫在革命中缔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给参议院的辞职咨文里，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二、参议院选举的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与国务员再辞职；

三、临时政府的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颁布的一切法令章程，除非经参议院改订，继续有效。

孙中山的意思很明显，是要求袁世凯脱离封建势力盘据的老巢，到革命势力比较强盛的南方来当总统，并用一部《临时约法》来约束他，防止他独裁。

一九一二年二月下旬，南京方面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对这个专使团非常“热情”，表示“极愿早日南行”，还对专使团说，他想先到武汉，拜访黎元洪，然后到南京就职。一席好话，骗得蔡元培等人深信不疑，但暗地里却早已安排好诡计。二月二十九日晚，袁世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专使团的负责人。酒性方酣，突然一声巨响，

一颗炮弹飞掠宴会厅的上空，接着枪声大作，火光烛天。北洋军第三镇突然“兵变”，大肆放火抢劫，专使团的寓所也被骚扰，吓得没有参加宴会的专使团人员，只得逃往外国教堂里去避难。第二天，保定、天津等地也同样发生“兵变”。北京的外交使团也配合行动，决定增调侵略军入京“护卫”。日本首先由山海关和南满分调驻屯军，由秦皇岛登陆，向北京推进。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大有八国联军重演的架势。

北京等地的“兵变”事件，首先吓坏了迎袁的专使先生们。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反而要求临时政府迁设北京。革命内部的反动势力，更是找到了借口。他们攻击革命派不顾国家安危，固执己见，造成了北方的危机。黎元洪甚至发出通电，说什么“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致亡”，完全与袁世凯一类反革命分子一个鼻孔出气。与此同时，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等军阀，再次通电，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

在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陷于孤立，此时更是无可奈何，只得听任立宪派操纵，在南京参议院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议案。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十三日，南京参议院同意袁世凯提名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四月一日，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五日，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至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撤销了最后一道防线，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式篡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起以袁世凯为头目的反革命专政。辛亥革命的

历史，到这时也就基本告终。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毛主席说：“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 这是对于辛亥革命最高的概括和最科学的总结。

中国本来是一个封建社会，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后，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一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辛亥革命，完全打垮了这个偶像，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创举。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一次又一次梦想在中国恢复封建帝制。但是，他们那些愚蠢的、违反历史潮流的反革命阴谋，没有一次不遭到可耻的失败。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连同他的“洪宪帝制”，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九一七年张勋搞复辟，把清朝皇帝抬出来十一天，就被赶下了台。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孙中山曾经号召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如果说，死抱住一个皇帝，对他顶礼膜拜，妄图从此生出许多奇迹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史悲剧所在；那么，把皇帝赶跑，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取得的最有积极意义的革命成果。

但是，问题不决定于名称，而决定于实质；不决定于形式，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八页。

而决定于内容。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实行君主制或民主共和制，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应该看哪个阶级掌握政权，他们所实行的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政策。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梦寐以求的“共和”制，虽然表面上确立了，但它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从窃国大盗袁世凯，到独夫民贼蒋介石，大大小小的卖国贼，都借用过“共和制”这件外衣，以掩盖他们军阀独裁和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性质，“中华民国”这块创始于辛亥革命的招牌，一直被挂在卖国政府的大门上。这清楚地说明，不能只改变一个名称，重要的还在于内容。

内容和形式、实质和名称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所谓国体问题，指的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谓政体问题，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辛亥革命只把皇帝赶走，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没有变，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社会性质没有变，反革命专政的内容没有变，所以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终究是失败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办法去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

辛亥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革命即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它的共和国方案是向西方资产阶级学的，是学法兰西共和国、美国独立战争的。而这时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更加紧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不是进行直接的统治，

就是扶植那个国家的封建势力,进行间接的统治。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这样一个纲领,他们对帝国主义却存有严重幻想,对封建势力又有密切联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不是采取坚决的革命路线,而是采取妥协投降的失败主义态度。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发动千百万人民群众投入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也借用过群众斗争的力量,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真正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的革命路线,相反是害怕群众、多方束缚群众的手脚。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刚取得一点胜利时,又马上以统治者的面孔出场,压制工农群众,解散群众武装,不少人被扣上“假冒革命”、“行动越轨”的罪名,遭到枪杀。这样就势必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国内外反动势力一反扑,他们就没有还手之力,旗靡辙乱,再也布不成阵势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它告诉中国人民,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对于帝国主义,绝不能存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和它们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中国要独立,中华民族要解放,就必须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去,同时消灭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封建买办势力。这个宏伟的革命目标,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亿万群众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达到。所以辛亥革命后,几经曲折,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毛主席说：“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①毛主席的教导，指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前进的方向。学习辛亥革命的历史，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毛主席教导的理解。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八页。